

唐宋之際建州浦城的家族與社會

吳修安*

南方的崛起是唐宋時期最重要的歷史變遷之一，其中福建從「險遠之地」到「全盛之邦」的演變最受到學界的關注。然而閩地的發展有沿海與內陸的地域差異，在唐代，相對於沿海的福、泉二州，位於內陸的建州社會文化發展仍較落後，但到了北宋卻有凌駕之勢。尤其是浦城在宋初出現了幾位領袖群倫的士人與家族，因此唐宋之際建州浦城的社會變遷，有助於進一步理解福建的崛起。本文首先復原唐宋時期浦城縣的鄉里組織，作為分析浦城地方社會的地理基礎。接著考察唐宋之際 7 個浦城地方豪右家族的背景、分布及其演變過程。唐末由於地方的動亂，浦城興起了 7 個以武力自衛的地方豪強，其中有當地土著，亦有外來移民，但並非是來自華北，而是來自浙贛的移民。他們的根據地多在縣城之外，是以土地墾殖為主的「州里豪右」。王閩、南唐時期，他們先後為福州與金陵政權所吸收，多被授與中央或地方軍職，但亦有若干家族成員棄武從文，其中楊氏是最早開始朝士人家族轉型的家族。這些家族在唐宋之際也存在密切的聯姻關係。到了北宋前期，除了范氏之外，這幾個浦城地方豪族多已朝士人家族轉型。

關鍵詞：唐宋之際、浦城、家族轉型、地方社會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一、前言

唐宋時期福建地區發展的變化歷來受到學界關注，宋代以前(特別是唐中葉前)，此地區一直被視為是蠻荒之地，經濟文化發展遠落後於鄰近地區；然而到了宋代，閩地竟一躍成為全國經濟文化重鎮。如此巨大的變化，在當時就引起人們的矚目：「睠昔甌粵險遠之地，今為東南全盛之邦」。¹因此，唐宋之際福建的發展歷程、社會文化變遷，及其所代表的意義為何？就成為學者關注的課題。²而當時閩中各地的發展，以位於閩西北的建州最令人感到驚奇。³由於閩中大山帶的阻隔，福建早期的發展有沿海(福、泉二州)與內陸(建州)的差異，前者背山面海，沿海分布許多較大的河流沖積平原，後者四面環山，在山河交互作用下形成許多分散的小型河谷平原盆地。閩西北雖因接近長江流域開發較早，但因為地形條件的限制，發展落後於沿海區。南朝後期沿海區崛起一批地方豪族，影響擴及周邊的浙贛地區，直到唐代初期

1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128，〈福建路·福州·四六〉，引張全真〈謝表〉，頁25a。

2 主要有日比野丈夫，〈唐宋時代における福建の開発〉，頁187-213，後收入日比野丈夫，《中國歷史地理研究》，頁229-250；李東華，〈擾攘與新機——唐宋之際福建地區的歷史發展〉，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75-492；蘇基朗，《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論稿》；Hugh R. Clark, *Community, Trade, and Networks: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凍國棟，〈唐代閩中進士登場與文化發展管見〉，頁157-166；陳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頁88-106，後修改收入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頁357-391。

3 本文所稱建州指的是北宋建州。唐代建州地域範圍大致包括北宋建州、南劍州與邵武軍三地。

仍持續影響當地政局，唐中葉以後這些地方豪族進一步「士族化」，學術表現甚為出色。而閩西北內陸區雖在南朝後期也出現一些地方「渠帥」，但他們「往往立砦以自保」沒有形成統合整個地域的地方豪族，到唐後期地方大族的豪強性格仍相當強烈。⁴然而唐宋之間，建州社會的變化相當大，以進士及第人數為例，唐五代時期，建州(範圍大致為北宋建州、南劍州與邵武軍三地)進士及第人數僅只有 5 位。而到了北宋，建州進士及第人數竟然攀升至全國首位，⁵成為一個典型的科舉社會，顯然唐宋之際建州社會出現了大幅度的轉變。那麼這一轉變的過程及其背景就成為首須關注的課題。而要瞭解地方社會的變遷，做為社會現象主要載體的家族就成重要切入點。

在閱讀相關史料的過程中，筆者注意到，唐末五代位於建州西北隅的浦城及其鄰近地區出現了許多地方豪強，他們是地方武力的領導者，接受王閩政權授予「指揮使」、「防遏使」、「制置使」等武職。他們之間不僅是同鄉，而且大都存在密切的婚姻關係。一直以來，唐末建州地方勢力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出身西南隅建寧縣的陳巖(849-892)，⁶他在黃巢(?-884)侵襲閩中時，「聚眾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⁷後來更據此

4 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沿海與內陸的地域差異》，頁 17-26、207-262。

5 唐五代進士人數依據吳修安的統計，而北宋進士人數則依據賈志揚與佐竹靖彥的統計。參見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頁 285、342-348；賈志揚，《宋代科舉》，頁 219-220、289-298；佐竹靖彥，〈唐宋時期福建の家族と社会——閩王朝の形成から科挙体制の展開まで〉，收入柳立言等編，《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25。

6 建寧縣始置於建隆二年(961)，唐末屬將樂縣地，太平興國六年割隸邵武軍。參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01，〈江南東道十三·邵武軍〉，建寧縣條下，頁 2019-2020。

7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卷 256，〈唐紀七十二·僖宗中和四年十二月〉，頁 8316。

武力收復福州，進而成為福建觀察使。浦城地方豪強的存在，顯示陳巖的崛起並非特例，而是唐末普遍存在於建州的現象，佐竹靖彥對此已有所描述。⁸但是唐末地方豪強群起的浦城，到了北宋前期，竟然呈現一幅文化鼎盛、人才輩出的景象，真德秀(1178-1235)曾如此形容：「國朝南方人物之盛自浦城始，浦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⁹亦即宋代浦城的人文發展，一開始就在南方居於領先地位。文莊公即楊徽之(921-1000)，公即徽之的從孫楊億(974-1020)，根據楊億為祖父楊文逸(914-978)與楊徽之所寫的行狀，浦城楊氏在唐末還是個崇尚武力的地方豪強。這不禁令人好奇，唐宋之際，浦城楊氏是如何從尚武的地方豪族轉變為尚文的士人家族？在當時浦城的地方豪族中，由武轉文的現象是否普遍？亦或楊氏的轉型只是特例？轉型的背景及背後所代表的意義究竟為何？

目前所見，與唐宋之際浦城地方勢力相關的研究成果，唯有佐竹靖彥的〈唐宋期福建の家族と社会——閩王朝の形成から科挙体制の展開まで〉，其重點在探討唐宋時期整個福建地域，如何從一個「蠻夷之境」，演變為一個科舉與道學發達的地區。文中以「王朝權力と建州の土豪」一節分析唐末五代初建州的地方豪族及其與王閩政權的關係。佐竹氏引用楊億《武夷新集》中有關浦城楊氏、張氏與崇安彭氏的記載做為論證建州土豪向有力豪族文官演變過程的史料依據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他接受羅香林(1906-1978)所建構的客家遷移學說，認為唐末建州土豪(包括陳巖)大多是在唐中期由華北遷徙南下的「客來戶」，他們在遷徙定居過程中，面對原住民的對抗與黃巢集團的攻擊，逐漸成為建州鄉里的支配者。後又因與王潮(846-898)集團同屬華北移民，進而與之結合，成為王朝官權的接受者。¹⁰據此，唐宋時期，包

8 佐竹靖彥，〈唐宋期福建の家族と社会〉，頁 387-401。

9 真德秀，〈跋楊文公書玉溪生詩〉，收入《全宋文》，第 313 冊，頁 200。

10 佐竹靖彥，〈唐宋期福建の家族と社会〉，頁 387-419。

括建州在內的福建社會接受科舉制度，是由華北移民所主導完成。但是真如佐竹先生所言，唐宋之際建州土豪多是華北移民嗎？當代人類學研究表明，族群會藉由忘記或虛構祖先，以達到重新整合族群範圍的目的。在有關福建沿海地方大族的研究中也印證這一現象，他們在唐代經歷了族群認同的轉變——拋棄原有的土著認同，轉而建構為中原土族後裔的身分認同。¹¹因此，對建州土豪的身分背景有重新檢討分析的必要，浦城是進出閩地的重要門戶，本文希望透過分析唐宋之際該地重要家族的身分認同及其發展過程，重新認識唐宋之際浦城，甚至整個閩西北地區的家族與社會變遷。

本文所運用的史料以北宋文集為主，其中以楊億的《武夷新集》最為重要，做為北宋前期出身浦城的重要文人，楊億為後世留下許多珍貴資料。透過他的詩文，不僅可以還原唐末五代若干浦城家族的歷史，還可重建楊億與各家族間의 交友與婚姻關係。從傳世文獻與出土碑銘等資料中，可以發現活躍於唐末宋初的浦城家族有楊氏、章氏、張氏、范氏、吳氏、黃氏與周氏等 7 個家族。

二、唐宋時期浦城的鄉里

為考察浦城各家族的地域分布，以下先復原唐宋時期浦城縣的鄉里。由於流傳至今的唐宋地方志不多，當時大部分州縣的鄉里資料都未被完整保留下來，浦城亦是如此，傳世文獻所載多是零散而簡略的鄉里資料。最早而完整記載浦城鄉里資料的文獻，是明弘治二年(1489)成書

¹¹ 瀨川昌久對華南族譜的研究也反映同樣現象，參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 45-60；瀨川昌久著，錢杭譯，《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族·風水·移居》，頁 1-25；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頁 127-137。

的《八閩通志》，該志〈鄉都〉部分記載了當時各縣鄉里資料，並概述各縣宋代以來的鄉里沿革。其中，浦城的鄉里沿革載云：「宋分十鄉，統三十二里。國朝改宜新里為四隅，并永吉、長樂為一里。餘仍舊，凡統圖一百五十又三。」¹²據此可依《八閩通志》所載浦城鄉里資料復原宋代(準確而言是南宋後期)浦城縣的鄉里，表 1 是依此方法所製作的浦城鄉里表。

表 1 《八閩通志》所載宋、明浦城縣鄉里表

南宋後期(十鄉三十二里)		弘治年間(十鄉四隅三十里)		
安仁鄉	宜新里	安仁鄉	東 隅	
			西 隅	
			南 隅	
	北 隅			
	太平里		太平里	西北二十里
	郊陽里		郊陽里	東北三十里
欽德鄉	募泰里	欽德鄉	募泰里	距縣十五里(縣東)
	泰寧里		泰寧里	距縣二十里(縣東)
	高泉里		高泉里	距縣六十里(縣東)
	大石里		大石里	東北四十里
永興鄉	永康里	永興鄉	永康里	距縣七十里(縣西北)
	船山里		船山里	距縣八十里(縣西北)
	畢嶺里		畢嶺里	距縣九十里(縣西北)
總章鄉	永平里	總章鄉	永平里	西五十里
	通德里		通德里	西北七十五里
忠信上鄉	清湖里	忠信上鄉	清湖里	南三十五里
	上元里		上元里	距縣七十里(縣東南)
	孝悌里		孝悌里	距縣四十五里(縣東南)
忠信下鄉	新興里	忠信下鄉	新興里	距縣六十里(縣西)
	仁風里		仁風里	距縣五十里(縣西)

¹² 黃仲昭修纂，《八閩通志》，卷 15，〈地理·鄉都·建寧府〉，頁 416。

東禮鄉	靖安里	東禮鄉	靖安里	距縣七十里(縣西南)
	東禮里		東禮里	距縣八十五里(縣西南)
	人和里		人和里	距縣九十里(縣西南)
昭文鄉	上相里	昭文鄉	上相里	距縣一十里(縣南)
	招賢里		招賢里	距縣十五里(縣南)
	登雲里		登雲里	縣南十五里
	總章里		總章里	縣西南七十里
戰初鄉	官田里	福安鄉	官田里	縣北四十里
	登俊里		登俊里	縣東北六十里
乾封鄉	長樂里	乾封鄉	長樂里	縣西二十五里
	永吉里		樂平里	距縣二十里(縣西北)
	樂平里		安樂里	距縣七十里(縣西北)
	安樂里		雁塘里	距縣九十里(縣北)
	雁塘里		忠信里	距縣七十里(縣北)
	忠信里			

說明：[戰初鄉]：指宋明間有變動的鄉里。

資料來源：《八閩通志》，卷 15，〈地理·鄉都·建寧府〉，頁 416-417。

那麼上表列舉的南宋浦城縣十鄉三十二里是否反映唐宋時期浦城的實際狀況？唐宋之際浦城縣鄉里也是十鄉三十二里嗎？期間是否有所變化？《太平寰宇記》是較早記載鄉里資料的地志，其在浦城縣條下僅載鄉數為「元十鄉」，¹³據此浦城的鄉里組織在唐宋之際似乎曾有變化。然而據《元豐九域志》的記載，北宋中期浦城縣的鄉數依舊為「一十鄉」，¹⁴因此可以推斷唐末至南宋的大部分時間，浦城一直維持十鄉建置。另外，從唐宋文獻中所留存的浦城鄉里記載，亦可證明唐宋時期浦城縣的鄉里組織有其延續性，表 2 是筆者從唐宋文獻記載所搜集到的浦城鄉里資料，在 19 個例子中，前 4 例為五代北

¹³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01，〈江南東道十三·建州〉，浦城縣條下，頁 2014。

¹⁴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 9，〈福建路·建州〉，頁 401。

宋時期的資料，後 15 例則為南宋時期的資料。

表 2 唐宋文獻記載中的浦城縣鄉里資料表

編號	鄉里名	性質	出處
1	敦信鄉仁風里	范韜葬地	《全唐文補遺》，第7冊
2	長樂里	楊文逸宅第	《武夷新集》，卷8
3	乾封鄉長樂里	楊徽之籍貫	《武夷新集》，卷11
4	安仁鄉龍興里	吳輔堯葬地	《古靈先生文集》，卷20
5	永興鄉畢嶺里	何欽承本貫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
6	永興鄉船山里	黃嗣康本貫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
7	忠信鄉新興里	徐詡葬地	《楊萬里集箋校》，卷125
8	昭文鄉上相里	章氏葬地	《搜神秘覽》，卷中
9	上相里	南峰院所在 (章德象功德院)	《輿地紀勝》，卷129
10	樂平里	萬葉院所在	《輿地紀勝》，卷129
11	郊陽里	宗叔院所在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建安志》
12	高泉里	千山院所在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建安志》
13	缸山里	安國院所在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建安志》
14	安樂里	杓木鋪所在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建安志》
15	忠信里	靈巖院所在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建安志》
16	仁 and 里	寶應院所在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建安志》
17	清湖里	禪寂院、翠巖院所在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建安志》
18	通德里	松林院所在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建安志》
19	嚴初里	西翟院所在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建安志》

總計蒐集到敦信、乾封、安仁、永興、忠信與昭文等 6 鄉與仁風、

長樂、龍興、畢嶺、船山、新興、上相、樂平、郊陽、高泉、安樂、忠信、仁和、清湖、通德與載初等 16 里。其中只有敦信鄉與龍興、載初里不見於表 1(按仁和里為人和里之誤¹⁵)，高達 8 成以上鄉里都能從表 1 中找到對應。事實上，這 1 鄉 2 里可能都是舊名，而非十鄉三十二里之外的鄉里。敦信鄉下統仁風里，在表 1 的南宋後期浦城鄉里中，仁風里與新興里同屬忠信下鄉，敦信鄉應該就是忠信下鄉的舊名，而從南宋浦城士人徐詡(1123-1188)的墓誌可知，紹熙元年(1190)新興里已隸屬於忠信鄉，¹⁶可以推測敦信鄉改名忠信鄉是在北宋至南宋前期之間。又忠信鄉與忠信上、下鄉之間的關係為何？如前所述，唐末至南宋，浦城縣的鄉數一直維持十鄉，因此忠信上、下鄉並非由忠信鄉分置而成，忠信下鄉是由五代的敦信鄉，經南宋中期的忠信鄉演變而來，因此忠信上鄉應該另有舊名，只是已佚其名。¹⁷據順治《浦城縣志》的記載，登俊里「舊名載初里」。¹⁸而龍興里隸屬安仁鄉，疑為宜新里的舊名。據此，表 1 南宋後期浦城縣十鄉三十二里，大約有一半可以在唐宋文獻中找到證據，可以相信它代表了南宋後期浦城縣鄉里組織的實際狀況，甚至很大程度反映唐末至北宋浦城的鄉里組織。又據《八閩通志》的記載，松溪縣崇信鄉慶元里「舊隸浦城縣，宋至道間(995-

¹⁵ 此為浦城縣舉子十二倉的記載，《八閩通志》亦有相同的記載，但文字略有出入，「仁和里」即作「人和里」，參見黃仲昭修纂，《八閩通志》，卷 61，〈恤政·建寧府·浦城縣·宋〉，頁 425。

¹⁶ 楊萬里撰，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卷 125，〈墓誌銘·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江東運判徐公墓誌銘〉，頁 4877。

¹⁷ 兩個不同名稱的鄉里，改為同名並分上下、東西、南北的例子並非罕見，參見梁克家修纂，《三山志》，卷 2，〈地理類二·敘縣〉，頁 9-11。

¹⁸ 李葆貞修，梅彥駒等纂，《(順治)浦城縣志》，卷 1，〈地理考·都里〉，頁 17b。

997)以益本縣。」¹⁹亦即直到宋太宗時期(976-997)，浦城縣轄下鄉里組織是有慶元里的，是時可能為十鄉三十三里。

那麼上述十鄉三十二里的具體地域範圍大致為何？其實從明中葉以降，浦城縣十鄉四隅三十里的鄉里組織就沒有變動過，僅隅里所統圖的數量略有增減(東隅、北隅由2圖增為4圖，清湖里由5圖減為4圖)。²⁰因此，可以推測十鄉四隅三十里的地域範圍並沒有明顯的變動，復原明清時期十鄉四隅三十里的具體地域範圍，就可大致釐清唐宋時期十鄉三十二里的地域範圍。《八閩通志》等早期明清方志雖對浦城的鄉里組織有較詳盡的記載，但內容僅及於里所統圖之數量，圖所統之村則「闕而不書」，無法據以復原鄉里的地域範圍。所幸嘉慶《浦城縣志》的編纂者開始在各圖之下注記境內村落：「茲特略舉其著名者，分注於各圖之下」，²¹這就使得復原十鄉四隅三十里的地域範圍有所依據。光緒《浦城縣志》延續這樣的體例，進一步加注更多的村名。²²1994年出版的《浦城縣志》在記述1980年代各鄉鎮轄下的村落時，亦注明清代里圖的對照。²³三者為筆者復原唐宋時期浦城鄉里地域範圍的主要依據，圖1是筆者推測復原的唐宋之際浦城縣鄉里區劃示意圖。

19 黃仲昭修纂，《八閩通志》，卷15，〈地理·鄉都·建寧府〉，頁419。

20 黃仲昭修纂，《八閩通志》，卷15，〈地理·鄉都·建寧府〉，頁416；何喬遠編撰，《閩書》，卷16，〈方域志·建寧府·浦城縣一〉，頁373；黃恬主修，《(嘉慶)新修浦城縣志》，卷4，〈城池·鄉〉，頁75。

21 黃恬主修，《(嘉慶)新修浦城縣志》，卷4，〈城池·圖〉，頁76-86。

22 翁天祐修，翁昭泰纂，《(光緒)浦城縣志》，卷2，〈疆域·鄉圖附〉，頁8a-18b。

23 浦城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浦城縣志》，頁75-95。

三、唐末地方豪強的來源、分布及其性格

福建早期的發展，外來移民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已是學界的共識。然而，對於外來移民的移入時間、移出地、以及原來的身分等問題其實存在不少的爭議。²⁴出現爭議的背景是唐宋時期閩地家族攀附中原世族的風氣，此一現象在當時已受到方大琮(1183-1247)、陳振孫(1179-1262)、鄭樵(1104-1162)等人的批評。²⁵因此，對當時史料中有關家族淵源的記載，不能一味接受，必須謹慎分析判斷。就這幾個活躍於唐宋之際的浦城地方家族中，哪些是外來移民？從何處移來？哪些是土著？他們在唐末五代是如何崛起？都須進一步探究。

(一)楊氏

在唐宋之際的浦城家族中，最先成名的便是以楊徽之與其姪孫楊億為代表的楊氏家族。如前述真德秀所言：「浦城人物之盛自文莊公及公始」，兩人在宋初的政壇與文壇都頗富盛名，後者更是宋初主流文體——西崑體的開創者。在宋人文集與史書中，浦城楊氏祖先的記載以楊億《武夷新集》及蘇頌(1020-1101)為楊徽之所寫的神道碑最為重要。楊億在為祖父楊文逸與從祖楊徽之所寫的行狀中，追溯浦城楊氏的遠祖：「先祖為華陰人，因永嘉之亂而南遷至上饒郡」。²⁶永嘉衣冠南

²⁴ 參見葛劍雄，〈福建早期移民史實辨證〉，頁 165-171；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頁 87-96、236-242。

²⁵ 方大琮，《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 3，〈題跋·跋方詩境敬長官遷莆事始〉，頁 1a-1b；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 8，〈譜牒類〉，頁 257；卷 17，〈別集類中〉，頁 500-501。

²⁶ 楊億，《武夷新集》，卷 8，〈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頁 135；

遷的說法在唐宋福建家族間甚為流行，其中大部分是屬於攀附，²⁷上饒並非永嘉亂後北方移民的遷入區，²⁸也不見有北方士族遷入當地的記載。而從楊億簡略的記載看來，楊氏家族對祖先在上饒的過往，甚至更早之前的記憶早已模糊，因此浦城楊氏源自弘農楊氏的說法恐怕亦是攀附。楊億接著追溯：到了肅宗上元年間，因劉展之亂，楊文逸與楊徽之的六世祖由上饒越過武夷山，遷居建州浦城。²⁹福建與江西之間隔著武夷山脈，其中有許多隘口可以通過，從秦漢以來就是閩贛間的交通要道，兩地關係相當密切，因此楊氏家族由上饒遷居浦城是極其自然與方便，而其在浦城的居住地——長樂里(縣北仙陽鎮境)正位於上饒越過武夷山脈進入浦城的交通要道上。再者，劉展之亂發生於肅宗上元元年至二年間(760-761)，為時僅三個月，主要戰亂地域在蘇南。這樣為時短暫、影響不大的動亂很少會出現在家族遷徙的記憶中，更何況是遠在上饒的楊氏家族。而就目前所見，它也僅出現在浦城楊氏的家族記憶中，可見劉展之亂對楊氏家族早期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當時上饒正值社會秩序重組，劉展之亂爆發前夕(乾元元年，758)，該地才以「川源夔遠，關防襟帶」的理由設置信州，³⁰官方統治力量尚未穩固，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引起地方的騷動。因此，有理由相信因劉

卷 11，〈故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祕書監上柱國江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兵部尚書楊公行狀〉(以下簡稱〈楊公行狀〉)，頁 180。按：上饒郡為信州的郡名，始置於乾元元年(758)。

²⁷ 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頁 236-242。

²⁸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 2 卷，頁 388-407；胡阿祥，《東晉南朝僑州郡縣與僑流人口研究》，頁 112-142。

²⁹ 楊億，《武夷新集》，卷 8，〈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頁 135；卷 11，〈楊公行狀〉，頁 180。

³⁰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07，〈江南西道五·信州〉，頁 2148。

展之亂的波及，浦城楊氏的祖先遷徙到浦城。值得注意的是數十年後，楊徽之神道碑銘所敘述的內容情節雖與楊億所述相似，但楊億的行狀中那些模糊、遙遠的祖先們，到了蘇頌所寫的碑銘中卻變得異常清晰：

胄出華陰著姓，漢太尉震七世孫，信安侯嚮之子奢，任晉鬱林太守，永嘉南渡徙籍上饒。奢之十五世孫光翼，唐上元中為信州刺史，以劉展亂江左，遣其子建安令宣，挈族人歸於閩，因家浦城，遂占數建安焉。³¹

這一祖先系譜，從楊嚮、楊奢、楊光翼到楊宣，在宋代以前的文獻全然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這個系譜是事實的復原？還是記憶的建構？回到楊億所寫的行狀似乎可以看出端倪。

楊文逸與楊徽之的六代祖遷居浦城後，定居於乾封鄉長樂里，³²在此楊氏家族「斬木誅茅，築室治產」，逐漸發展成為累世「以財力雄于州里」的地方豪族。³³到了他們的曾祖父楊式時，楊氏仍舊只是地方豪族，當時楊式「蹈德詠仁，隱居求志」，³⁴並未擔任任何官職。至唐末，

³¹ 蘇頌，《蘇魏公文集》，卷 51，〈碑銘·翰林侍講學士正奉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秘書監上柱國江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贈太子大師諡文莊楊公神道碑銘并序〉(以下簡稱〈楊公神道碑銘并序〉)，頁 765。

³² 楊億，〈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云：「玉山府君以太平興國三年六月三十日，啓手足于長樂里之第」。而〈楊公行狀〉亦云：「建州浦城縣乾封鄉長樂里楊徽之」，見楊億，《武夷新集》，卷 8，〈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頁 135；卷 11，〈楊公行狀〉，頁 180。因此乾封鄉長樂里應該是浦城楊氏家族的祖居地，其地約在今浦城縣北仙陽鎮境內。

³³ 楊億，《武夷新集》，卷 8，〈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頁 135。而〈楊公行狀〉亦載：「自高、曾以來，用財力雄於州里」，見楊億，《武夷新集》，卷 11，〈楊公行狀〉，頁 180。

³⁴ 楊億，《武夷新集》，卷 8，〈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頁 135。蘇頌，〈楊公神道碑銘并序〉云：「公之曾祖式，辟王潮參謀軍事，未幾辭歸，終老於家」，見蘇頌，《蘇魏公文集》，卷 51，〈碑銘·楊公神道碑銘并序〉，頁 765。按：楊部約在黃巢入閩後「聚眾自保」，而王潮是

因黃巢入侵閩地，造成地方秩序崩潰，楊式的兒子楊郢起而聚眾自保，組織地方自衛武力，維護家族以及鄉里的安全。楊文逸的行狀指出：

王父郢，屬唐季倣擾，干戈日尋，奕世聚居，羣從百口，非用武斷不能亢宗，於是募鄉民之拳勇者數百人，受署于本郡為義軍指揮使。堅壁要害，以備不虞，一邑賴之，終以無患。烈考弼，遭時未乂，結髮從軍，受署義軍討擊副使。³⁵

從楊郢及其子楊弼(楊億曾祖父)組織地方自衛武力，以及楊億後來形容這段時期的楊氏家族時所云：「家世從戎旅之事」、「內外家世皆服縵胡而冠武弁」看來，³⁶這支地方自衛武力應是以楊氏家族為核心所組成。這是楊氏崛起的重要關鍵，此後家族「以豪舉聞于郡中」，「總輿師而提尺籍，輜輶鼓吹，盛於一方」，³⁷成為以武功出仕，著稱於

在昭宗景福二年(893)攻陷福州，盡有閩中五州之地，以此推算楊式擔任王潮參謀軍事的機率不高。

- ³⁵ 楊億，《武夷新集》，卷 8，〈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頁 135。
 〈楊公行狀〉亦云：「唐季倣擾，乃祖鳩合義旅幾乎千人，保境亢宗，一邑是賴，受署義軍指揮使」，見楊億，《武夷新集》，卷 11，〈楊公行狀〉，頁 180。而蘇頌，〈楊公神道碑銘并序〉則云：「祖郢，當唐季盜起，率合義徒千餘人，保守土境，補閩義軍指揮使，累官至本州防禦使。」，見蘇頌，《蘇魏公文集》，卷 51，〈碑銘·楊公神道碑銘并序〉，頁 765。按：防禦使為軍事類使職，安史之亂後，刺史例兼防禦使或團練使以掌軍事。唐末五代，防禦使與團練使的行政職能逐漸擴大，後遂以防禦使或團練使稱呼刺史，以區別不帶使職的刺史。五代期間，建州原本隸屬福州威武軍節度使，於後晉天福六年(941)建為鎮安軍節度使。楊郢官至建州防禦使，應是以建州刺史兼防禦使，而楊郢官至建州防禦使當在景福二年(893)建州刺史徐歸範投降王潮，至貞明四年(918)王延稟開始長期擔任建州刺史間。參見陳志堅，《唐代州郡制度研究》，頁 72-75；朱玉龍，《五代十國方鎮年表》，頁 470。
- ³⁶ 楊億，《武夷新集》，卷 7，〈序·送倚序〉，頁 126；卷 8，〈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頁 136。
- ³⁷ 楊億，《武夷新集》，卷 7，〈序·送倚序〉，頁 126；卷 8，〈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頁 136。

鄉里的家族。由此可知，早期浦城楊氏呈現出強烈地方豪強性格，全然不見官宦家族的經歷與氣質。因此，楊徽之神道碑所記載的祖先系譜恐怕是出於虛構。

(二)章氏

在所有浦城家族，章氏對祖先記憶的複雜與分歧程度，是最令人感到訝異的。最早記載章氏祖先的文獻是宋祁(998-1061)為章得象(978-1048)所寫的墓誌銘。墓誌銘通常是由墓主後代子孫提供墓主的家世背景與生平事蹟，作者再據此撰寫墓誌銘，因此主要反映墓主後代子孫當時的認知。銘文寫到：「其先齊太公裔，封於鄆，去『邑』為章氏。僑徙不常，後為武寧望姓」，³⁸前段追溯章氏淵源，內容引自姓氏書，³⁹可略而不論。從「僑徙不常」的敘述可知，在早期章氏家族的記憶中，成為「武寧望姓」之前的家族歷史是模糊不清的。而楊億在《武夷新集》中亦多用「武寧章氏」，⁴⁰可見宋初浦城章氏是以「武寧」為姓望。「武寧」一般認為是指洪州武寧縣，始置於武則天長安四年(704)，⁴¹根據《古今姓氏書辯證》、北 8418 號〈姓氏錄〉與《太平寰宇記》的記載，豫章郡的姓望皆有章氏，⁴²因此浦城章氏以洪州武寧為家族來源地是有所依據的。

³⁸ 宋祁，《景文集》，卷 59，〈誌銘·文憲章公墓誌銘〉，頁 785。

³⁹ 參見林寶，《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 5，〈十陽·章〉，頁 583。

⁴⁰ 楊億，〈送四十舅翁東遊詩序〉：「武寧茂才章公實，先大夫之叔舅」；楊億，〈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府君娶武寧章氏，駕部郎中(仁)嵩之女也」，見楊億，《武夷新集》，卷 7，〈送四十舅翁東遊詩序〉，頁 120；卷 8，〈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頁 136。

⁴¹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 28，〈江南道四·江西觀察使·洪州〉，武寧縣條下，頁 670。

⁴²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卷 13，〈上聲·十陽·章〉，頁 191；鄭炳林校注，《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頁 346；樂史，《太平寰宇記》，

此後章氏由洪州武寧遷徙至建州浦城的論述(「洪州武寧說」)陸續出現，成為宋代許多章氏族人的祖源記憶。在章得象族人章友直(1006-1062)的墓誌銘中首見遷徙之說：「君家建安者，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⁴³雖然較為模糊籠統，但已點出其高祖是由洪州遷徙至建州。撰寫於紹興年間(1131-1162)的章緯(1054-1119)墓誌銘也是採取類似敘述：「世家豫章，後徙建安」。⁴⁴章炳文的《搜神秘覽》(成書於政和年間[1111-1118])則進一步指出章氏祖先是武寧遷往浦城，並具體提出時代背景：「吾族九代祖避黃巢之亂，自洪州武寧徙於建安浦城」，⁴⁵而章元任(1063-1129)的墓誌銘(撰寫於紹興年間)卻將遷徙時代置於五代：「其先占籍武寧，五季之亂有徙於建安之浦城者。」⁴⁶顯見章氏族人對「洪州武寧說」的內容並沒有形成共識。值得注意的是「洪州武寧說」的故事情節一直甚為簡略，並沒有被進一步加工形成完整的祖先系譜與流傳，這反映「洪州武寧說」本身的侷限性及其影響力的衰落。

北宋中葉以降，「泉州說」逐漸取代「洪州武寧說」成為主流，認為浦城章氏的祖先是從泉州遷徙而來。此說最早出現在曾鞏(1019-1083)編纂的《隆平集》，〈宰臣·章得象傳〉載云：「世居泉州。高祖任偽閩建州刺史，因家浦城。」⁴⁷章得象的高祖被視為浦城章氏的

卷 106，〈江南西道四·洪州〉，頁 2101。

⁴³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 91，〈墓誌·建安章君墓誌銘〉，頁 947-948。

⁴⁴ 孫覿，〈宋故左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公墓志銘〉，收入《全宋文》，第 160 冊，頁 461。

⁴⁵ 章炳文，《搜神秘覽》，卷中，〈郇公〉，頁 137。

⁴⁶ 周紫芝，〈朝議大夫章公墓銘〉，收入《全宋文》，第 162 冊，頁 324。

⁴⁷ 曾鞏撰，王瑞來校證，《隆平集校證》，卷 5，〈宰臣·章得象〉，頁 180。按：司馬光記錄於仁宗至神宗年間(1022-1085)，以備撰寫《資治通鑑後紀》的《涑水記聞》引黃好謙云：「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任王氏為刺史，號章太傅。」可知浦城章氏為泉州人的說法尚不為世人所知。參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 9，〈章太傅夫人練氏〉，頁 177。

開基祖，他就是被稱為「章太傅」的章仔鈞。元豐年間(1078-1085)，曾鞏曾擔任史館編纂，參與修定《五朝國史》，因此得以接觸到眾多官方收藏的原始資料，其中包括傳主家族送來的行狀、家傳等。⁴⁸《隆平集》的資料應該多出自於此，亦即「泉州說」恐怕也是出自章得象後代子孫之手。而在「掇取《五朝史傳》及《四朝實錄附傳》，而微以野史附益之」⁴⁹的《東都事略》，與參考大量宋代官方史料的《宋史》中，〈章得象傳〉亦有大致相同的記載，⁵⁰可見此說應該已被曾鞏編入《五朝國史》，成為宋代官方通行的版本。對比章得象墓誌銘的模糊，《隆平集》對浦城章氏祖先始居地與遷徙時間的描寫則具體而明確，短短二、三十年，章得象子孫輩對祖先的記憶竟然出現如此重大的轉折。

北宋末年，浦城章氏的系譜出現新變化，章仔鈞不再是開基祖，徙居蘇州的章甫(1045-1106)墓誌銘載云：「八世祖及為康州刺史，自南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釗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閩，故號仔釗為小太傅。」⁵¹銘文中的南康恐為南安之誤，據此章仔鈞的祖父才是章氏由泉州徙居浦城的開基祖。章甫乃章仔釗的直系後代，亦即這一改變出自非章仔鈞直系後代的章氏族人。據南唐范韜(891-950)的墓誌銘記載，章太傅有位弟弟，官銜為「大衙使」，⁵²這位大衙使是否就是章仔釗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浦城章氏並非只有章仔鈞一系。只是章仔鈞裔孫太過於興旺與強勢，長期掩蓋其他支系的聲

48 王瑞來，〈隆平集考述〉，收入曾鞏撰，王瑞來校證，《隆平集校證》，「前言」，頁20。

49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4，〈制作·續資治通鑑長編附東都事略〉，頁113-114。

50 王偁，《東都事略》，卷56，〈章得象傳〉，頁441；脫脫等，《宋史》，卷311，〈章得象傳〉，頁10204。

51 楊時，《楊龜山先生全集》，卷35，〈誌銘六·章端叔墓誌銘〉，頁1a。

52 葉雲，〈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收入《全唐文補遺》，第7冊，頁200。

音，章甫墓誌銘如此描述：「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釗之後居珠林，自是分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⁵³幾乎整個北宋時期，浦城章氏的名人顯宦都是出自章仔鈞一系，而章甫墓誌銘的描述，反映章氏其他支系的崛起，意欲參與祖先系譜的建構。

何以「泉州說」會取代「洪州說」？成書於紹興年間的《古今姓氏書辯證》提供了一條線索，該書所載「唐貞觀所定」被認為是引自貞觀年間(627-649)修撰的《氏族志》，⁵⁴其中泉州南安郡姓望有章氏，然而在其他文獻中卻找不到任何南安郡姓望包括章氏的蛛絲馬跡。⁵⁵這不禁讓人懷疑《古今姓氏書辯證》所引「唐貞觀所定」內容的真實性，南安郡為中古閩地唯一的郡望，是由唐代官方認定的新興郡望，其形成與當地部分大族於隋唐之際進入中央職官體系，成為唐太宗(626-649在位)眼中的「今朝冠冕」有關。⁵⁶南安郡姓望中聲望最高的就屬傳統閩地沿海大姓——閩中四姓的林氏與黃氏，其政治與社會地位自然非其他一般家族所能比擬。而至遲在武后年間，泉州地方大姓間就已經流傳永嘉衣冠南遷的說法，並逐漸擴展至其他沿海大姓，甚至是內陸豪族，至宋初形成所謂的八姓入閩傳說。⁵⁷顯見泉州地方大族對當時閩地社會文化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他們最早面對主流文化衝擊，進而建構出能與中原衣冠士族銜接、納入主流體系的祖先系譜。身為北宋閩地新興士人家族的浦城章氏，在復原已經模糊不清的祖先記憶時，不可能不參考已有的範式。事實上，至遲在南宋前期，永嘉衣冠南遷的

⁵³ 楊時，《楊龜山先生全集》，卷 35，〈誌銘六·章端叔墓誌銘〉，頁 1a。

⁵⁴ 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頁 225，註 42。

⁵⁵ 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表 5-1 唐宋史料所見『南安郡』郡姓表」，頁 223。

⁵⁶ 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頁 227-231。

⁵⁷ 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頁 236-242。

情節也已被編入「泉州說」中，成書於淳熙十五年(1188)的《錦繡萬花谷·續集》記載了加工後的內容：「章仔鈞，其先岳，仕晉，永嘉中守泉州，因家焉。後唐季康州刺史及者，由南安徙居建之浦城。」⁵⁸前述章甫墓誌銘所揭示的內容也被編入系譜，成為後世浦城章氏祖先系譜的主要版本。⁵⁹由上述討論可以清楚看到「泉州說」被層累造成的過程。

但浦城章氏真的是從洪州武寧遷徙而來的嗎？據《元和郡縣圖志》的記載，浦城在武后統治期間也曾改名武寧(天授二年至神龍元年，691-705)，⁶⁰因此，「武寧」亦有可能就是浦城的舊稱。在浦城章氏的祖先記憶中，有一則故事——章得象高祖母練氏的傳說特別引人矚目，相傳章仔鈞任職建州時，其妻練氏解救其下兩將，因而使建州於南唐入據時，免於被屠城的命運。⁶¹這則故事在北宋中葉以後廣泛流傳於士人之間，被視為是章仔鈞一系成為江南望宗，人才備出的原因，可見章仔鈞與練氏在其後裔心中擁有極其崇高的地位，而為士人社群所熟

58 不撰著人，《錦繡萬花谷·續集》，卷22，〈類姓·章·練氏陰德〉，頁7a-7b。

59 目前所見有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26，〈章·章仔鈞〉，頁2a-2b；戴良，〈章氏家乘序〉，收入《全元文》，第53冊，卷1627，頁224；宋濂，〈御史中丞章公神道碑銘〉，《明名臣琬琰錄》，卷6，頁15b-16a；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卷16，〈序·金華章氏世譜序〉，頁537。也有若干文獻所載系譜雖加入「永嘉衣冠南遷」的情節，但仍以章仔鈞為「開基祖」，見謝維新編，《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13，〈類姓門·章〉，練氏陰德條，頁12a-12b。

60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29，〈江南道五·福建觀察使·建州〉，浦城縣條下，頁719。

61 關於當時章仔鈞的職位有不同說法，免於被屠城的是否為建州也有疑問，但從後來建寧府城設置練氏祠堂看來，建州說成為通行的說法。參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9，〈章太傅夫人練氏〉，頁177；陳師道，《後山談叢》，卷5，頁69；葉夢得，《石林燕語》，卷10，頁153；夏玉麟、汪佃修纂，《建寧府志》，卷11，〈祀典·建寧府〉，頁255。

知。值得注意的是，在 1981 年出土於浦城的〈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中，記載了誌主范韜的次子「婚浦城章太傅弟大衙使女十二娘」。⁶²不僅證實前述章仔釗的記載有所依據，而且顯示在當時浦城豪族的眼中章太傅就是當地人，章氏家族在唐末五代才徙居浦城的說法是錯誤的，他們恐怕在浦城已經居住了好幾個世代了。大衙使聯姻的對象范氏是浦城南部臨江鎮的豪強，章太傅的妻子練氏亦是建州的傳統大姓，《古今姓氏書辯證》引《千姓編》云：「今建安多此姓。自言先世仕閩，食邑於閩之練鄉，因以為氏。」⁶³章氏與練氏、范氏的聯姻顯示他們氣質相類，不管浦城章氏是否為外來移民，在五代以前，他們恐怕已在浦城長期深耕，與當地豪族同類。

那麼唐末浦城章氏是如何崛起的？章仔鈞顯然是關鍵人物，在此之前，由於史料無徵，其發展已不得而知。從〈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的記載看來，「章太傅」的稱呼並非後世虛構，而是章仔鈞確實擁有的官銜。據北宋文獻，章仔鈞是以武功任官於王閩政權，《涑水記聞》記載章仔鈞「仕王氏為刺史」，⁶⁴刺史在唐末五代亦多負責戎事。《後山叢談》則云：「章氏之先起家將，為王氏守北邊，號大傅。」⁶⁵指得就是章仔鈞。而《石林燕語》亦云章仔鈞「為王審知偏將，領軍守西巖」。⁶⁶後兩者皆直接指出章仔鈞是以武職出身，他在當時應該建立了不少功業。因此，浦城章氏是在唐末五代戰亂之際，以武力投身時局的競逐而崛起。

62 葉雲，〈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收入《全唐文補遺》，第 7 冊，頁 200。

63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卷 32，〈去聲·三十二霰·練〉，頁 495。

64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 9，〈章太傅夫人練氏〉，頁 177。

65 陳師道，《後山叢談》，卷 5，頁 69。

66 葉夢得，《石林燕語》，卷 10，頁 153。

(三)張氏

現存有關浦城張氏的史料以墓誌銘為主，最早是楊億為張仲仁(939-1000)所寫的墓誌銘，其次是張仲仁從子張沔(983-1060)的墓誌銘，最後則是張沔之子張諷(1015-1076)與張誨(1024-1077)的墓誌銘。⁶⁷對於浦城張氏的淵源，張仲仁墓誌銘如此記載：「其先清河人，後徙建安之吳興，遂為著姓。」⁶⁸直接以中原張氏最著名的「清河」望作為浦城張氏的郡望。據郭鋒的研究，唐朝肅代以後，「清河」已經轉變為所有張氏的同姓共望，⁶⁹因此，浦城張氏源出清河的說法恐怕是出於攀附，不可盡信。而在張沔與其子張諷的墓誌銘中，則出現了一套全然不同的祖先系譜，這個系譜追溯浦城張氏的先祖至漢初張良(?-186 B.C.)與三國張紘(152-211)，而張紘的後代由鄱陽遷徙至浦城。但對於系譜中是誰始居鄱陽？誰由鄱陽徙居浦城？父子墓誌銘出現截然不同的說法，張沔的墓誌銘云：「其先出留侯子房，三國之分，紘仕孫氏，由是為江南人。其後居鄱陽者，曰子員，子員生瑤，瑤徙建安之浦城，瑤生厲，厲生大王父從晟。」⁷⁰而張諷的墓誌銘則云：「漢留侯七世孫，紘居

⁶⁷ 楊億，《武夷新集》，卷9，〈墓誌一·故宋陝州芮城令清河張君墓誌銘〉，頁143；劉敞，〈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60冊，頁5-7；沈遼，〈張司勳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79冊，頁248-252；〈宋太子中舍張傳師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79冊，頁242-244。

⁶⁸ 楊億，《武夷新集》，卷9，〈墓誌一·故宋陝州芮城令清河張君墓誌銘〉，頁143。

⁶⁹ 參見郭鋒，〈郡望向姓望轉化與士族政治社會運動的終結——以清河張氏成為同姓共望為例〉，頁82-85。

⁷⁰ 劉敞，〈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60冊，頁5。

番陽，至五代祖晟，乃自番陽徙浦城，遂世仕於閩。」⁷¹對照《三國志·張紘傳》的記載，張紘既不是張良之後，也不曾居於鄱陽，⁷²上溯先祖至張良與張紘的作法也是出於攀附。而從張仲仁墓誌銘「當王氏之據有閩越也，曾祖從晟，為州里豪右」的記載看來，⁷³張從晟不可能是浦城張氏的開基祖，張諷墓誌銘所呈現的系譜並不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張氏由鄱陽徙居浦城的論述，按東漢以降，鄱陽湖周邊一直有張氏活動的記載，⁷⁴張氏雖未被列入豫章、尋陽與鄱陽等郡姓望，也非傳統地方大姓，但為當地傳統姓氏無疑。因此，浦城張氏自鄱陽遷徙而來的說法是有所依據的。從同一家族先後出現兩個完全不同祖先系譜看來，宋初浦城張氏在成為士人家族後，不同支系各自復原或建構自己的祖先系譜，才會出現如此南轅北轍的結果。

張氏由鄱陽遷徙入閩後，定居於浦城西南部的仁風里(臨江鎮西山下溪流域)，⁷⁵到了唐末，張從晟已是浦城當地的「州里豪右」，後仕王閩

71 沈遼，〈張司勳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79冊，頁248。按「五代祖晟」應即張沔的「大王父從晟」。

72 陳壽，《三國志》，卷53，〈張紘傳〉，頁1243-1246。

73 楊億，《武夷新集》，卷9，〈墓誌一·故宋陝州芮城令清河張君墓誌銘〉，頁143。

74 周天遊輯注，《八家後漢書輯注·謝承後漢書》，卷7，〈張冀傳〉，頁230；《三國志·三嗣主傳·孫休傳》：「(永安七年秋七月)豫章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見陳壽，《三國志》，卷48，〈三嗣主傳·孫休傳〉，頁1161-1162。《南齊書·周山圖傳》：「豫章賊張鳳，聚眾康樂山，斷江劫抄」，見蕭子顯，《南齊書》，卷29，〈周山圖傳〉，頁541。《新唐書·孝友傳》：「鄱陽張讚，……弋陽張球，……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見歐陽修，《新唐書》，卷195，〈孝友傳〉，頁5576-5577。

75 張仲仁的墓誌銘載云：「以咸平三年六月十八日卒于仁風里之私第，……其年某月日歸葬于襄衡源，順也」。據此仁風里應是張氏的聚居地，據《八閩通志》的記載仁風里在縣西五十里，其地約在今浦城縣臨江鎮西山下溪流域。按：明代福建的鄉里名稱多沿襲宋末。參見楊億，《武夷新集》，

政權，官至「蒲城制置副使、工部尚書」。⁷⁶閩國制置使的設置與職權雖無從得知，但根據畑地正憲的研究，吳與南唐的制置使多設置在交通、軍事、經濟等要衝之地，率軍統轄數州至一縣不等的地域，軍事是其最重要的職掌。⁷⁷閩國制置使應該與其相去不遠。因此，合理推測張從晟是以其「州里豪右」的身分，擁有雄厚自衛武力，為王閩政權所吸收，擔任地方軍職。

(四)范氏

關於浦城范氏家族的文獻資料甚少，在 1981 年〈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於浦城出土之前，⁷⁸僅能從明代地方志得知浦城縣登雲里有座安邊廟，「廟祀二神，一姓黃名寵，一姓范名滔」，皆該里下沙人，「唐末，閩中亂，寵為制置鎮節級，范為廂虞侯，皆有戰功而亡，後人為立廟。五代唐長興四年，偽閩始改元，並封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上柱國。」⁷⁹這兩位神祇是否確有其人？流傳的事蹟是否真實？亦或曾經被加油添醋？並沒有其他史料可資

卷 9，〈墓誌一·故宋陝州芮城令清河張君墓誌銘〉，頁 143；黃仲昭修纂，《八閩通志》，卷 15，〈地理·鄉都〉，頁 298。

⁷⁶ 楊億，《武夷新集》，卷 9，〈墓誌一·故宋陝州芮城令清河張君墓誌銘〉，頁 143。

⁷⁷ 畑地正憲，〈吳·南唐の制置使を論じて宋代の軍使兼、知軍事に及ぶ〉，頁 78-79、82。

⁷⁸ 首見於趙洪章，〈浦城發現南唐范韜墓誌銘〉，頁 74-76。

⁷⁹ 黃仲昭修纂，《八閩通志》，卷 59，〈祠廟〉，頁 382-383。又載：「五代唐長興四年，偽閩始改元，並封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上柱國。」《(嘉靖)建寧府志》與《閩書》的記載略同，見夏玉麟、汪佃修纂，《建寧府志》，卷 11，〈祀典〉，頁 275；何喬遠，《閩書》，卷 17，〈方域志〉，頁 379-380。

佐證。由於〈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的出土，不僅大體印證明代方志關於范滔記載的真實性，也提供唐末五代浦城范氏家族的系譜、婚宦以及王閩、南唐在浦城的軍事行動等相關訊息。從墓誌銘所提供的內容可知誌主范韜是在王審知(897-925 在位)統治閩地後出仕，曾經擔任上左廂虞侯，在南唐政權下的最終官銜為昭武軍在城諸指揮都軍頭虞侯、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行右監門衛將軍同正、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最後以疾「薨于撫州」。⁸⁰對比明代方志的記載，雖然若干情節略有出入，但從姓名、官銜及其戰功來看，范滔的原型無疑就是范韜，安邊廟兩位神祇的記載乃言而有據。作為唐末五代浦城的地方武裝力量之一，范氏家族不可避免地被捲入王閩與南唐間的戰爭，范韜先後征戰於浦城及其鄰近地區，立下不少戰功，不僅有助於家族勢力的維持和發展，也符合鄉里的利益。因此他的事蹟得以在鄉里間流傳，進而被立廟祭祀。

在范韜的墓誌銘中，追溯范氏祖先至春秋末年越國丞相范蠡，稱范韜為范蠡的第十六代孫。⁸¹但范蠡距范韜所處年代約有一千四百年，范韜不可能是范蠡的第十六代孫，這又是一個典型攀附歷史名人的事例。范韜家族應該早已世居當地，至少可以確定是在范韜的祖父范容之前就已經居住在浦城。據明方志的記載，范滔為登雲里下沙人(今連塘鎮南下沙村)，但墓誌銘載云，其葬地在「浦城縣敦信鄉仁風里」，即臨江鎮西山下溪流域，而墓誌出土地在臨江鎮西北的瓦鋪村，位於山下溪匯入臨江溪的對岸，清代仍為仁風里轄地。臨江鎮是早期浦城范氏的根據地，范韜之父范漢曾任「臨江鎮使」。⁸²臨江與下沙間僅隔海拔不高的樟元山(古

⁸⁰ 葉雲，〈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收入《全唐文補遺》，第7冊，頁199-200。

⁸¹ 葉雲，〈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收入《全唐文補遺》，第7冊，頁199。

⁸² 葉雲，〈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收入《全唐文補遺》，第7冊，頁199。

稱西陽山(或西陽嶺)，為臨江鎮通往縣城的交通要道。⁸³從居地、葬地到根據地都在臨江鎮及其鄰近地區，可見該地區是浦城范氏最初勢力範圍。

浦城范氏的崛起亦與家族本身具習武風氣、在地方局勢變動時以武力出仕有關。范容最終官銜為衙推，雖是藩鎮下層的文職僚佐，⁸⁴但銘文中記載他「宿習文武」，並非孱弱的文士。而范韜的父親范漢則被直接以「剋之功，人間罕媿；桓桓之勇，世上難儔」來形容，顯見他武勇強悍，功績卓著，最終擔任「建州浦城四界指揮使、臨江鎮使」，為浦城南部的軍事領袖。范漢的子孫也大都投身行伍，先後在王閩與南唐政權中擔任軍職。⁸⁵可見唐末五代范氏家族強烈的武質性格。

(五)吳氏

目前所見北宋前期的浦城吳氏家族有兩支，一是吳輔堯(987-1059)的家族，一是吳待問(?-1050)的家族。據吳輔堯墓誌銘的記載：「君之始家閩中。曾祖承蘊，仕五代至顯官。祖仁凱，國初為廣州新會縣令」，可知其家族早已在王閩或南唐政權任官，被陳襄(1017-1080)視為浦城的

⁸³ 按明清時期由縣城往臨江鎮的舖遞先後為十里舖(亦名下沙舖)、余回舖和臨江舖，其中西陽嶺是「由余回路通臨江」的必經之地。參見夏玉麟、汪佃修纂，《建寧府志》，卷8，〈公署〉，頁275；黃恬主修，《（嘉慶）新修浦城縣志》，卷3，〈山川〉，頁58。

⁸⁴ 嚴耕望將「衙推」列為方鎮的文職僚佐，但並未說明它的職掌。渡邊孝則認為「衙推」為下級幕職官，並分析指出「衙推」無固定職掌，而是被權宜地派遣負責各種任務，但未包括軍事任務。參見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收入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頁200；渡邊孝，〈唐代藩鎮における下級幕職官について〉，頁92。

⁸⁵ 葉雲，〈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收入《全唐文補遺》，第7冊，頁199-200。

衣冠大姓之一。⁸⁶而吳待問家族早期的發展就沒這麼好，北宋中後期流傳兩則該家族墓地風水的傳聞：其祖「昔葬其親，貧而無地，同里張氏遺其山圃之閑隙」；其母過逝，無家人在旁，而由鄰人代為安葬。這兩個墓地的風水被後人認為是吳待問父子得以相繼中舉，同朝為官的因素。但也顯示在吳待問登第前，其家族貧窮而勢孤。吳待問年輕時也因「少孤貧賤」，為同在楊億門下的同鄉章得象與黃鑑(1015 進士)等人所輕視。⁸⁷其長子吳育(1004-1058)的墓誌銘如此記載家族祖先：「吳氏世為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⁸⁸但二十多年後，幼子吳充(1021-1080)的墓誌銘已將祖先攀附為季札之後：「有吳君子延陵季札之後，是生相國，字冲卿，其先為建州蒲城人。肇緒自札，而子孫散居南方顯微，下歷千餘載」，吳待問的父祖不再是一般的貧窮百姓，而是「不仕唐末」、「明儒學教授鄉里」的士人。⁸⁹

其實吳氏是閩西北傳統大姓之一，在漢末賀齊討伐的閩西北山越中就有吳免與吳六兩位豪首，其中之一相傳就居於浦城縣城外東郊募泰里的吳山，《太平寰宇記》引《建安記》云：「山四面秀異，人居其側，多吳姓。漢興，有吳氏六千戶別屯大澤，即此之民也。」⁹⁰可見吳氏是當地綿延甚久的土著大姓。但相對於前述幾個大姓，吳氏在

⁸⁶ 陳襄，《古靈先生文集》，卷 25，〈墓誌銘·吳君唐卿墓誌銘〉，頁 13b。

⁸⁷ 章炳文，《搜神秘覽》，卷上，〈楊文公〉，頁 111；卷下，〈地里〉，頁 148；孫升口述，劉延世筆錄，《孫公談圃》，卷上，〈吳待問老母葬地〉，頁 105。

⁸⁸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 33，〈墓誌·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公墓誌銘〉，頁 486。

⁸⁹ 李清臣，〈吳正憲公充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 79 冊，頁 55。

⁹⁰ 陳壽，《三國志》，卷 60，〈賀齊傳〉，頁 1378；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01，〈江南東道十三·建州〉，浦城縣條下，頁 2015。此卷多引《建安記》的記載，因此，《記》疑為梁蕭子開的《建安記》。

唐末五代的系譜與事蹟甚為模糊，這恐怕與吳氏曾受到王閩政權的鎮壓有關。據范韜墓誌銘記載，他首件重要軍功就是平定時妖吳播的叛亂，事在天福五年(940)之前。⁹¹吳播的身分地位與浦城吳氏捲入這場叛亂的程度，現已無從知曉。值得注意的是，長興四年(933)閩國爆發建州土豪吳光「帥其眾且萬人叛奔吳」的事件，隨後吳光「請兵於吳」，與信州刺史蔣延徽由浦城進攻建州，隔年敗閩兵於浦城，但不久兵敗建州。⁹²此事范韜應曾親身經歷，然墓誌銘卻隻字未載，這不禁令人懷疑銘文中的吳播與吳光的關係？吳播是否就是吳光？亦或吳播參與了吳光的叛閩行動？兩者叛變都發生在天福五年之前，且銘文曾以「為望天負地之輩」來形容吳播，這用來形容「奔吳」的吳光更為貼切。⁹³如果推測屬實，那麼唐末五代浦城吳氏本是勢力極其雄厚的地方豪族，因而被王閩政權所吸收，吳播與吳光的叛亂均以失敗告終，對浦城吳氏應該產生嚴重的衝擊，致使族人對這段過往皆沉默以對。

(六)黃氏

北宋浦城黃氏最有名、支派繁延最廣的家族是出自黃元吉一系，黃元吉曾仕宦於南唐，兩子黃觀(1008進士)、黃覺(1005進士)皆進士及第，家族遂成為官宦之家。本居於「浦城谿東」，⁹⁴北宋前、中期，家族成員因仕宦緣故陸續北遷。谿東(仙陽鎮溪東村)位在仙陽鎮東北的永康

⁹¹ 葉雲，〈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收入《全唐文補遺》，第7冊，頁199。

⁹²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卷278，〈後唐紀七·明宗長興四年七月戊子〉，頁9085；〈明宗長興四年十一月〉，頁9096；〈潞王清泰元年正月〉，頁9100-9101。

⁹³ 魯西奇認為吳播當即吳光之族，參見魯西奇，〈福建所出唐宋元時期買地券考釋〉，頁33。

⁹⁴ 樓鑰，《樓鑰集》，卷110，〈奉議郎黃君墓誌銘〉，頁1903。

里，周邊是黃氏的聚居地。⁹⁵對祖先系譜的追溯最先見於黃覺之子黃孝綽(997-1070)的墓誌銘：「上世為建之浦城人，……曾祖郎，祖元吉，嘗仕江南李氏，非其好去之，有詩名。」⁹⁶但十餘年後，在孝綽之子黃莘(1021-1085)的行狀與墓誌銘中卻將祖先系譜上溯至江夏黃氏，並增加遷徙入閩的情節：「其先江夏人，遭唐末之亂，其族分適江南、西蜀，惟建安浦城為著姓。」⁹⁷然這並未成為家族的共同記憶，黃莘的姪子黃陞(1074-1138)與黃觀裔孫黃子游(1080-1167)、黃仁檢(1115-1196)、黃仁榮等人的墓誌銘中皆不曾將家族與江夏黃氏相連。⁹⁸因此，浦城黃氏源自江夏黃氏應是黃莘子孫攀附之說。

從黃元吉家族的祖先系譜，並無法得知唐末五代的浦城黃氏是如何面對變局？范韜墓誌銘的出土提供了若干線索，首先，它印證了安邊廟神祇范滔及其事蹟的真實性，也間接證實安邊廟另一位神祇黃寵及其事蹟的可靠性，黃寵曾任制置鎮節級，為浦城制置使轄下的武將，⁹⁹亦即唐末五代浦城登雲里附近存在一個以黃寵為首、軍功起家的黃氏家族。其次，它記錄了范韜家族曾與黃氏有兩代 4 次聯姻的關係——姐

⁹⁵ 除了黃元吉的家族之外，亦有其他黃氏家族居住在谿東，而位在永康里西北的船山里則是工部侍郎黃輔國家族的居地。見馮登府，《閩中金石志》，卷 7，〈宋·集慶寺鐵井欄文 至和元年〉，頁 12736；佚名，《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頁 106a-106b。

⁹⁶ 劉摯，《忠肅集》，卷 14，〈墓誌銘·潛山黃先生墓誌銘〉，頁 285-286。

⁹⁷ 楊傑，〈故朝奉郎知汝州黃府君行狀〉，收入《全宋文》，第 75 冊，頁 248；劉摯，《忠肅集》，卷 14，〈墓誌銘·潛山黃先生墓誌銘〉，頁 287。

⁹⁸ 汪應辰，〈黃公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 215 冊，頁 243；韓元吉，〈中奉大夫直敷文閣黃公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 216 冊，頁 267；周必大，〈朝請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黃公子游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 232 冊，頁 274；樓鑰，《樓鑰集》，卷 110，〈奉議郎黃君墓誌銘〉，頁 1903。

⁹⁹ 節級在宋代泛指軍校與軍兵之間的下級軍官，如軍頭、十將、將虞候等，參見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頁 247-248。

嫁大夫黃澹、長子娶黃鄴之女、四子娶黃績之女、三女嫁笥後將黃懷之男黃仁用，¹⁰⁰雖然銘文未說明這些聯姻對象的出身，但從范韜家族的其他聯姻對象多為浦城或鄰近地區的地方豪族，以及其官銜為文散官與下級武將看來，這些黃氏成員出身浦城地方豪族的可能性相當大。另外，王閩末期，出身浦城的福州在城鎮遏使黃仁諷(?-945)背叛殷主王延政(943-945 在位)，很大程度影響當時政局，史載其「少有武幹，隸本城為鄉兵，以陣敵立功，累遷飛捷指揮使」。¹⁰¹因此，可以推測在唐末五代浦城已有若干黃氏家族崛起，其過程大概與前述家族類似，即以武力自衛面對動亂，進而為王閩與南唐政權所吸收。黃元吉家族與黃寵、黃仁諷等人的關係已無從得知，但其在唐末五代的經歷恐怕不脫黃寵或其他浦城家族的模式，黃元吉也才得以仕宦於南唐。

(七)周氏

北宋時期出身浦城的周氏以周武仲(1074-1128)家族為代表，其早期發展僅見楊時(1053-1135)為周武仲所寫的墓誌銘。銘文中追溯祖先為周王室後裔與漢代周仁(活躍於 188-141 B.C.)後代，這明顯是攀附之說，可置而不論。值得注意的是後續載云：「其後綿遠，族眾散適他郡，有居處之遂昌者。公之遠祖避唐亂，自遂昌徙之浦城，故今為浦城人。」¹⁰²遂昌接壤浦城東北，唐宋時期兩地之間已有隘嶺可供交通，¹⁰³往來並非難事。因此，周氏由遂昌徙居浦城之說應可信無疑，而他們是遂昌土著，亦或

¹⁰⁰ 葉雲，〈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收入《全唐文補遺》，第7冊，頁200。

¹⁰¹ 路振，《九國志》，卷10，〈閩·列傳·黃仁諷〉，頁3338。

¹⁰² 楊時，《楊龜山先生全集》，卷36，〈誌銘七·周憲之墓誌銘〉，頁1a。

¹⁰³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01，〈江南東道十三·建州·浦城縣〉，上原嶺條下，頁2015。

是外來移民，已無從知曉。接著銘文記載，唐末五代的祖先曾連續三代仕宦於王閩與南唐政權，¹⁰⁴七世祖周璣「仕王氏為銀青光祿大夫」，只是兼帶的文散官，非真正蒞事的職官。而從六世祖周彥卿「為王氏先鋒將」看來，早期周氏恐怕也是以武力出仕，周璣真正的職官應為武職。可以推測，周氏在徙居浦城後，逐漸發展成武質性格強烈的地方豪強，在唐末戰亂不斷的政局中以武功仕宦於王閩政權。

周氏家族遷入浦城後的居住地，墓誌銘並未被述及(可能與家族在周武仲之父遷居吳縣有關)，但從周武仲從兄弟周因的葬地在孝悌里推測，¹⁰⁵該里可能是周氏家族在浦城的鄉里籍貫。

(八)小結

從上述分析可知，這些崛起於唐宋之際的浦城地方家族中，有些是當地土著，如范氏與吳氏；亦或土著可能性較大，如章氏與黃氏；有些顯然是外來移民，如楊氏、張氏與周氏。但是後者並非佐竹先生所言是來自華北的客來戶，而是唐中期由鄰近浦城的浙贛地區遷徙而來，並無跡象顯示他們是華北移民的後代。閩西北與贛東北(撫、信二州)、浙西南(衢、處二州)三地從六朝以來民間互動往來就極為頻繁密切，風俗習慣本就沒有太大差異，¹⁰⁶楊、張、周等三個家族遷入浦城，要面對的不是族群對立與文化衝突，而是經濟利益的爭奪。再者，這三個家族都是在黃巢之亂前就遷居浦城，到了唐末至少已繁衍三代，綿延百

¹⁰⁴ 楊時，《楊龜山先生全集》，卷36，〈誌銘七·周憲之墓誌銘〉，頁1a-b。

¹⁰⁵ 夏玉麟、汪佃修纂，《(嘉靖)建寧府志》，卷20，〈丘墓〉，頁661。

¹⁰⁶ 據《隋書·地理志》對揚州各地風俗的描述，東陽與吳郡、會稽「其俗亦同」，「豫章之俗，頗同吳中」，永嘉、建安、鄱陽、臨川「其俗又頗同豫章」。魏徵等，《隋書》，卷31，〈地理志下·揚州〉，頁886-887。

年，這使得他們與當地土著家族的關係日益密切，進而融為一體，這可從家族早期所展現的特質與他們之間的聯姻關係得到印證。

前述 7 個浦城地方家族，不管是當地土著還是外來移民，在唐末五代都呈現強烈的武質化傾向。從楊氏的例子推測，這個傾向應該是根植於他們「稱雄州里」的經濟實力。在唐代浦城這樣一個土地墾殖正在擴展、國家權力尚未深入的地區，地方家族必需要有能力維持自身利益與勢力，進而成為鄉里的領袖，才能被視為是該地豪強或豪族。也因此得以在唐末地方秩序崩潰之際，聚眾以武力自保。在建州，地方豪族聚眾自保的情況並非只出現在唐末浦城。梁唐之際，由於侯景(503-552)之亂造成地方政府權力崩潰，建州也出現一批「立砦自保」或「擁眾自保」的豪帥。¹⁰⁷這一事實顯示梁末至唐末的建州社會並沒有本質性改變，地方豪族一直是建州社會的主導力量。

就地域分布而言，唐宋之際浦城地方豪族主要集中在三個地區，一是中部縣城周邊，西側西巖附近為章氏家族聚居地，東側吳山則為吳氏家族的居地。二是北部仙陽鎮周邊，仙陽鎮所在的長樂里為楊氏家族根據地，東北永康里則為黃氏家族的族居地。三是南部臨江鎮周邊，張氏家族居於西側仁風里，范氏家族雄據臨江鎮，附近還有另一個黃氏家族。三地皆位在浦城主要的河谷盆地上，且是南北交通要道所經，經濟與交通上有其優勢，¹⁰⁸因而成為早期各家族聚居墾殖之地，是各家族發展為「州里豪右」的經濟基礎。進一步分析，三個外來移民家族的移居地皆不在縣城周邊，反映唐中後期，該地區已無空間容納外來移民墾殖，浦城形成傳統中心區為土著所盤據，外圍新興地帶

¹⁰⁷ 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頁 253-256。

¹⁰⁸ 浦城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浦城縣志》，頁 134；吳修安，〈唐宋時期浦城交通路線考〉，收入朱鳳玉、汪娟編，《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397-432。

則為土著與移民雜處的區域分布格局。

四、王閩、南唐時期浦城豪族的仕宦經歷與婚姻關係

浦城地方大族是如何從晚唐的豪強家族演變為北宋的士人家族？介於兩者之間的王閩與南唐時期無疑是重要關鍵。一般而言，觀察古代家族的崛起與維繫，仕宦與婚姻是兩個重要的切入點，由此，可以瞭解家族的發展及其性質。以下就從這兩個方面考察王閩、南唐時期浦城地方大族的演變過程。

(一)王閩時期浦城豪族的仕宦經歷——以武職為主

五代十國時期，前述浦城地方豪強先後轉變成王閩與南唐政權之下的官僚，這一經歷顯示他們的豪族性質已從社會性開始轉向政治性，對其後續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因此，以下先就浦城豪族在王閩與南唐政權中的仕宦經歷進行考察，瞭解其待遇與世代差異。表 3 是對前述 7 個浦城家族成員在王閩、南唐時期的仕宦資料所做的整理。

表 3 浦城地方大族在王閩、南唐政權中的仕宦經歷

編號	世代	姓名	王閩	南唐	性質	出處
1	二	楊邨	義軍指揮使 / 義軍校 建州防禦使		武職事	《武夷新集》·卷 8 / 11 《蘇魏公文集》·卷 51
2	三	楊弼	義軍討擊副使		武職事	《武夷新集》·卷 8
3	三	楊澄	威武軍節度使幕僚		？	《武夷新集》·卷 11
			浦城縣令		文職事	
4	四	楊文逸	試秘書省校書郎[解褐]		試官	《武夷新集》·卷 8
				右千牛衛胄曹參軍 知建州倉事	試官 文職事	
				右千牛衛騎曹參軍知建州倉 事	試官 文職事	

				右千牛衛騎曹參軍撫州南豐簿	試官 文職事	
				大理評事 信州玉山令 兼總軍政	試官 文職事 兼官	
				大理司直	試官	
5	一	章仔鈞	將[起家] / 偏將		武職事	《後山談叢》，卷 5 《石林燕語》，卷 10
			刺史 / 建州刺史 / 高州刺史 檢校太傅		職事 / 遙領 檢校官	《凍水記聞》，卷 8 《搜神秘覽》 《東都事略》，卷 56
6	一	章仔釗	大衛使 ¹⁰⁹ 泉州團練副使		武職事 遙領	《全唐文補遺》，第 7 冊 《楊龜山先生全集》，卷 35
7	二	章仁嵩		駕部郎中	檢校官	《景文集》，卷 59
8	二	章口口		建州軍事推官	文幕職	《臨川文集》，卷 91
9	三	章公實		(建安)郡文學	試官	《武夷新集》，卷 7
10	一	張從晟	蒲城制置副使 工部尚書		武職事 檢校官	《武夷新集》，卷 9
11	二	張贊	建州長史		文散官	《武夷新集》，卷 9
12	三	張仁邈	檢校左散騎常侍		檢校官	《武夷新集》，卷 9
13	三	張龔	?			《雲集編》，卷 9
14	四	張仲仁		太常寺奉禮郎	試官	
				秘書省校書郎	試官	《武夷新集》，卷 9
				建州松溪尉	文職事	
15	二	范漢	建州浦城四界指揮使 臨江鎮使		武職事	
16	三	范韜	浦城左先鋒將		武職事	
			上左廂虞侯		武職事	
			保勝西巖指揮使		武職事	
				信州左先鋒指揮使[實職]	武職事	
				江州左神威軍第三指揮使	武職事	
				殿直指揮使	武職事	
				浦城靜邊保勝弓弩等諸指揮軍使	武職事	《全唐文補遺》，第 7 冊
				撫州口口軍在城諸指揮軍使 右軍散押衙[職]	武職事	
				昭武軍在城諸指揮都軍頭虞侯 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尚書左僕射 行右監門衛將軍同正 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	武職事 文散官 檢校官 (試官) 兼官 勳	

¹⁰⁹ 按：大衛使不見於史籍記載，性質不明，但唐末五代，節鎮及其支郡普遍設置有都押衙、押衙等武職，大衛使或類同都押衙。參見劉安志，〈唐五代押衙(衙)考略〉，頁 66-68。

17	三	范勝		制置處侯	武職事	
18	三	范皎		銀青(光祿大夫) 左散騎常侍	文散官 檢校官	
19	四	范仁聿	福口口護駕散指揮使		武職事	
20	四	范仁通	神武軍右弓箭指揮口軍頭 處侯 檢校禮部尚書		武職事 檢校官	
21	四	范仁珣		銀青(光祿大夫) 左散騎常侍	文散官 檢校官	
22	四	范仁遇		永安軍靜邊第一指揮 控鶴都主兵副兵馬使	武職事	
23	四	范仁衛		撫州左長劍指揮右散軍將	武職事	
24	一	吳承蘊		?(顯宦)	?	《古靈先生文集》,卷 20
25		黃仁諷	鄉兵			《九國志》,卷 10
			飛捷指揮使		武職事	
			福州在城鎮遏使		武職事	
26		黃龍	制置鎮節級		武職事	《八閩通志》,卷 59
				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太子賓客 兼監察御史 上柱國	文散官 檢校官 兼官 勳	
27	二	黃元吉		?	?	《忠肅集》,卷 14
28	一	周璣	銀青光祿大夫		文散官	《楊龜山先生全集》,卷 36
29	二	周彥卿	先鋒將		武職事	
30	三	周文之		殿中丞	試官	

隨著王潮於景福二年(893)攻陷福州，閩地五州最終盡為王潮所有，¹¹⁰由浦城豪強組織的地方自衛武力也都隨之歸附，王閩政權透過官職授予將他們納入麾下。從上表可知，這些浦城豪強多在王閩政權中擔任武職，尤其是最初歸附的前兩代家族成員，這與他們身為地方自衛武力的領導者有關。楊郃與楊弼父子是最明顯的例子，據楊億追溯，兩人分別受署為義軍指揮使與義軍討擊副使。義軍並非官方性質的正規兵制，而是一種介於官兵與私兵之間的鄉兵制度，原先由民間組織用以自衛鄉里，後為州郡兵的補充。¹¹¹亦即王閩政權透過非正式的軍事組織收

110 歐陽修，《新唐書》，卷 190，〈王潮傳〉，頁 5492。

111 就筆者所見尚無對閩國兵制的詳細研究，以南唐兵制而言，義軍是屬於一種鄉兵制度，閩國義軍應與此相似。參見日野開三郎，《唐末五代初自衛義軍考》；杜文玉，《五代十國制度研究》，頁 464-466。

編這支由楊氏家族所領導的地方自衛武力，成為浦城的鄉兵。王閩時期浦城的鄉兵似乎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王延政麾下的黃仁諷就是出身浦城的鄉兵，「以陣敵立功」，累遷為飛捷指揮使。¹¹²

但是浦城豪強更多的是成為地方軍編制內的中、下層武將，任職區域大抵不出浦城、建州，成為王閩政權統治當地、抵禦外敵的重要力量。除了黃仁諷之外，章子鈞起家為將，長期「為王氏守北邊」，官至建州刺史；黃寵為制置鎮節級，「有戰功而亡」。范韜的經歷更能彰顯浦城豪強在保衛鄉里與抵禦外敵的作用，據其墓誌銘記載，他於王審知「蒞祚」為閩王時(開平三年，909)出仕，「守曆資階，充浦城左先鋒將」，後因平定吳播之亂有功而升遷至上左廂虞侯，天福五年(940)在浦城西巖擊敗吳越軍，被「殷主」王延政拔擢為保勝西巖指揮使，從出仕到南唐據建州前的官職升遷皆在浦城，為王閩政權的統治做出不少貢獻。¹¹³再加上張從晟、范漢與周彥卿等人的官銜，可以推測浦城豪強是王閩時期浦城地方軍的骨幹，承擔浦城軍事防禦的主要任務。

值得注意的是，范韜長子范仁聿與次子范仁通並未在浦城或建州地方軍中擔任武將，而是任職於福州的禁軍系統(約在 933-943 年間)，¹¹⁴前者還特別受到閩王的寵幸。王閩的中央軍原本是以光州、壽州籍將領士卒為核心骨幹(王審知時期的威武軍，及以之為基礎建置的拱宸都與控鶴都)，出身

112 路振，《九國志》，卷 10，〈閩·列傳·黃仁諷〉，頁 3338。杜文玉認為飛捷軍屬禁軍，但從王延政與黃仁諷的記載看來，飛捷指揮使黃仁諷是被王延政從建州派往福州擔任護衛。因此，飛捷軍應非福州的閩國禁軍，而是王延政在建州稱帝後所建置的殷國禁軍。參見杜文玉，《五代十國制度研究》，頁 500。

113 葉雲，〈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收入《全唐文補遺》，第 7 冊，頁 199。

114 按：王延鈞稱帝之後，閩國始有禁軍制度，是以王審知的親兵部隊——威武軍為基礎組建。其禁軍系統之中有扈駕小牌軍，隸屬威烈效節軍，並沿襲唐制設有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參見杜文玉，《五代十國制度研究》，頁 499-502。

浦城的地方豪強得以進入中央禁軍，顯示王閩後期，原有的統治基礎已經出現變化。是時統治集團內部出現分裂，內亂不斷，王審知以降三位閩主(王延翰、王延鈞、王繼鵬)相繼死於兵變，而泉州與建州地方勢力的影響力則日趨擴大。¹¹⁵從范韜的生年(891)推算，范仁聿與范仁通任職禁軍系統大約是在 20-30 歲之間，亦即他們釋褐後的仕宦經歷應該都在禁軍系統內，這意味著兩人進入禁軍恐怕是出自王閩中央的意志。吸納地方實力者(官宦、豪族)的子弟至中央任官，一方面可以籠絡地方豪強，擴大政權的統治基礎，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他們視為人質，確保對地方的掌控。其實在此之前，楊弼之弟、楊徽之的父親楊澄即曾入福州威武軍節度使幕府，楊徽之的行狀如此描繪這一過程：「王氏之據有閩隅也，物色異人，寤寐豪傑。首畫奇策，請見牙門，忠懿王奇之，即日解褐，置之幕府。未幾賜五品服，拜本縣令。」¹¹⁶亦即楊澄是主動前往福州向王審知獻策，在未有出身的情況下被辟請入幕的。然而從他未久任幕職即「拜本縣令」推斷，「首畫奇策」而成為王審知幕僚的情節恐非事實，楊澄前往福州應另有隱情。結合范仁聿兄弟的情況考量，楊澄或許是以浦城豪族子弟的身分被王審知召至福州，並暫時安置於幕府。據此可以推測王閩時期應該存在徵召地方豪族子弟至福州安置的政策，對於一個以少數統治多數的外來政權而言，這是擴大統治政權基礎、維持統治穩定的必要手段。

楊澄仕宦經歷所突顯的意義並不止於此，其一，他是王閩時期首位文官出身的浦城豪強子弟，開啟了楊氏家族以及浦城豪族由武質性向文質性轉變的進程。雖不知他入幕後擔任何職，但從後人追溯其「生戎馬間」，卻「博通文史，為鄉黨所稱」，以及後來「拜本縣令」看

¹¹⁵ 徐曉望，《閩國史》，頁 57-62。

¹¹⁶ 楊億，《武夷新集》，卷 11，〈行狀·楊公行狀〉，頁 180。

來，¹¹⁷他擔任的應該是文職幕僚，亦即他的仕宦經歷全然都是文官。其二，楊澄出仕不久，即被「賜五品服」派任浦城縣令(從六品)，並長期擔任此職，¹¹⁸這不僅對楊氏家族的後續發展有重要影響，也衝擊當時浦城由豪強所組成的地方社會。楊氏家族原為浦城北部長樂里的鄉里豪族，雖因唐末動亂而自組地方自衛武力，為王閩政權所吸收，自衛武力被收編為義軍，楊部父子也順勢成為義軍指揮官，但除此之外並沒有任何改變。然而楊澄以初出茅廬之資，「拜本縣令」，一躍而成為浦城最高行政長官，王審知此舉不無刻意拉抬楊氏以制衡其他豪強的意圖。另一方面，楊氏家族也因此得以走出鄉里，將活動重心移往縣城，他在縣令任內曾於城西夢筆山麓建等覺禪院做為家族功德寺，直到北宋中期，仍有家族後人「主其世祀」。此寺也成為楊澄子姪輩的修業處所，楊徽之年少時就曾讀書於此。¹¹⁹他在任內並著意提攜子姪，如蔭任楊弼之子、楊億的祖父楊文逸，「纔十餘歲，解褐試秘書省校書郎」，¹²⁰凡此都進一步促使家族往文質化發展。

從上表還可以注意到有些浦城豪強的官銜明顯不是武職，然而這並不表示他們並非武官出身。一般而言，唐代官員完整的官銜包括職事官、散官、檢校官、爵、勳等，其間品秩並不一定相同，特別是中唐以降，唐代官制出現重大變化，使職逐漸取代職事官，職事官階官

117 楊億，《武夷新集》，卷11，〈行狀·楊公行狀〉，頁180。

118 按唐縣分七等：赤、畿、望、緊、上、中、下，開元二十五年(737)制定的大唐官品，赤縣令為正五品，畿縣令為正六品，上縣令為從六品。而據《元和郡縣圖志》浦城縣為緊縣，故唐代浦城縣令應為從六品，楊澄被「賜五品服」，一方面顯示楊澄受到王閩中央的重視，另一方面亦證實王閩政權已不遵唐制。

119 蘇頌，《蘇魏公文集》，卷51，〈碑銘·楊公神道碑銘并序〉，頁766；真德秀，〈楊文莊公書堂記〉，收入《全宋文》，第313冊，頁441。

120 楊億，《武夷新集》，卷8，〈表·故信州玉山府君神道表〉，頁135。

化，散官、檢校官與勳等的授予則日漸浮濫，¹²¹其品秩往往遠高於職事官或使職，因此成為最常被強調與記錄的官銜。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章仔鈞常被稱為「章太傅」，但他的職事官其實是武官，而太傅是他的檢校官。因此，對上述這些浦城豪強的官銜不應一概視為職事官，而要進一步釐清。就張氏家族而言，張從晟之子張贇受蔭為建州長史，長史在唐代為府州上佐，然中唐以後漸無職事，成為寄俸祿、位閒員的職位，¹²²建州長史恐怕並非張贇真正的職事官。而張贇之子張仁邈的官銜則為檢校左散騎常侍，中晚唐檢校官主要是授予方鎮長官及文武僚佐的加官，以表示其秩階與升遷經歷，其中散騎常侍主要是授給方鎮長官。¹²³從「李氏之平建安也，常侍辭疾家居」¹²⁴的記載看來，他的職事官應該是建州鎮武軍節度使的僚佐，這顯示王閩政權對於檢校官的授予已不遵循中晚唐的規制了。而周氏家族中，周璉的官銜——銀青光祿大夫為文散官，但中晚唐以降，已有許多武官帶文散官銜，因此，無法據以判斷其是否為文官。雖無從得知他們的職事官為何，但從其家族成員的仕宦經歷推測，恐怕是以武職為主。

透過授予官銜，而非強力鎮壓，王閩政權將這些浦城家族納入統治集團，除了吳氏家族後來因叛亂，遭到鎮壓，各家族的勢力基本受到尊

121 王壽南，〈唐代文官任用制度之研究〉，收於王壽南，《唐代政治史論集》，頁 1-12。

122 嚴耕望，〈唐代府州上佐與錄事參軍〉，收入嚴耕望，《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頁 454-461。宋代州長史已無職事，成為安置恩授士人初官、責降官、納粟人、武官遷轉、三班使臣年老不任事的散官，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頁 538。

123 參見張國剛，《唐代官制》，頁 169-170；賴瑞和，〈論唐代的檢校官制〉，頁 195-203。

124 楊億，《武夷新集》，卷 9，〈墓誌一·故宋陝州芮城令清河張君墓誌銘〉，頁 143。

重，得以延續。因此各家族成員大多留在家鄉浦城或建州，少部分進入王閩政權的福州朝廷，擔任地方或中央的武職官。

(二)南唐時期浦城豪族的仕宦經歷——向文職轉變

南唐保大三年(945)，南唐攻滅王閩取得建州。對抗數十年的敵對者，如今成為統治者，對浦城豪族在內的建州地方勢力而言，這是不小的衝擊，面對新局勢，他們必須作出抉擇。前述張仁邈選擇「辭疾家居」，不願在南唐政權下仕宦。但這並不是大多數人的抉擇，出身建陽、以驍勇齊名的建州武將陳誨(?-962)與林仁肇(?-972)在抗擊南唐的圍攻時，曾屢次阻擋南唐軍的攻勢，然而他們在王閩政權滅亡後接受招撫，最終成為南唐政權的重要將領，前者被「委鎮邊境」，擔任建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後者在抵抗周世宗(954-959 在位)取淮南的戰役中，累有戰功，官至南都留守、南昌尹。¹²⁵這樣的現象並非特例，浦城豪強中也有類似的情況，范韜就是選擇成為南唐武將，歷任侍衛諸軍及信州、浦城與撫州等地方藩鎮的中上層武職，經歷雖不如陳誨與林仁肇顯赫，但卻是建州豪族在南唐軍中仕宦的另一種典型。值得注意的是范韜並非在南唐圍攻建州期間(944-945)投降，而是在王延政以建州稱帝開國的前一年投奔南唐，墓誌載云：「止王寅年(昇元六年，942)，高皇帝(李昇)詔諭，割職信州」，直接被安置在對付王閩政權的最前線，在此之前他正是浦城軍事要地西巖的指揮官。¹²⁶范韜投奔南唐明顯衝

¹²⁵ 龍袞，《江南野史》，卷5，〈陳誨傳〉，頁5190-5191；卷9，〈林仁肇傳〉，頁5221-5222。

¹²⁶ 葉雲，〈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收入《全唐文補遺》，第7冊，頁199。按：西巖與延平津在王閩時期同為建州的軍事要地，章仔鈞為王氏守邊就是屯駐於此。參見馬令，《南唐書》，卷2，〈嗣主傳〉，頁5270；葉夢得，《石林燕語》，卷10，頁153。

擊王閩政權在浦城的軍事防禦佈署，是時正逢閩主王曦(939-944 在位)與王延政持續交兵，無暇顧及此一危機。果不其然，范韜後來參與了南唐圍攻建州的軍事行動，並「自部領驍師收破西巖洞寨」，瓦解王閩政權在浦城的軍事力量。另一方面，范韜投奔亦顯示南唐對建州的人才爭奪與情報收集早在李昇時期(937-943)就已經開始，前述南唐入閩軍統帥查文徽能夠順利進據建陽，就是得利於同鄉臧循於閩地行商時的情資。¹²⁷因此，南唐在李昇時期雖實行「息兵睦鄰」的外交政策，¹²⁸但其實對一統南方的戰略意圖一直存在。范韜在南唐政權中的仕途頗為順遂，其兄弟兒子也多在南唐軍中供職，這顯示范韜投奔南唐的舉動，並非他個人的魯莽行為，而是整個家族的共同抉擇。

不同於范氏家族，其他投身南唐政權的浦城豪族則不見有擔任武職者，在南唐取得建州後，原先仕宦於王閩政權的浦城家族成員大多轉為南唐文職，似乎被刻意地被排除於南唐軍事組織之外，如楊文逸先後擔任撫州南豐簿與信州玉山令等職。¹²⁹章仔鈞有 13 個兒子，大多數仕宦經歷皆不見記載，僅知章得象的曾祖章仁嵩「仕李昇為駕部郎中」；其子章士廉則官至汀州寧化縣令，另一子章公實「始委質江吳為郡文學」。¹³⁰張仁邈之子張仲仁於「李氏之平建安」後，「策杖行在，叩闈上書，朝論奇之，即授太常寺奉禮郎，改秘書省校書郎，調補本州松溪尉」，張仁邈的弟弟張靄亦「仕南唐」。¹³¹

127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卷 284，〈後晉紀五·齊王天福八年〉，頁 9278。

128 關於李昇的外交政策，見鄒勁風，《南唐國史》，頁 74-79；杜文玉，《南唐史略》，頁 41-44；何劍明，《沉浮——一江春水——李氏南唐國史論稿》，頁 16-30。

129 楊億，《武夷新集》，卷 8，〈表·故信州玉山府君神道表〉，頁 136。

130 宋祁，《景文集》，卷 59，〈誌銘·文憲章公墓誌銘〉，頁 785；楊億，《武夷新集》，卷 7，〈送四十舅翁東遊詩序〉，頁 120。

131 楊億，《武夷新集》，卷 9，〈墓誌一·故宋陝州芮城令清河張君墓誌銘〉，

如前所述，某些家族成員早已開始轉向文職，楊氏家族首位文官就是楊澄，據載他「生戎馬間，獨業文史」，¹³²而其所任職位也與武職無關。到楊澄的子姪輩，由武轉文的風氣有進一步的發展，楊億在描述祖父楊文逸(楊弼之子)年輕讀書求學的情景時，做了以下的記載：

始在童丱，遨遊膠庠，博習親師，服膺素業。家世從戎旅之事，以豪舉聞于郡中，而府君恥事輕肥，雅好學問，被服造次，必于儒者。¹³³

羣從叔季憑藉世資，習尚豪舉，競養聲利爭為節俠。唯玉山府君勞謙降志，刻苦讀書，好學之名聞於州里，以孝廉射策，委質江吳，以儒雅從政，仕至宰邑。¹³⁴

可知楊文逸從幼年就開始習文，在當時群從兄弟大多從事戎旅生活，習尚豪舉的風氣之下，他反而不喜愛這種生活，以讀書求學為職志。然從其在南唐任官的經歷來看，他應該亦熟悉於戎旅之事，任玉山縣令時，「邑有鎮兵兼總軍政，……先甲發令，卒乘畏威，泮林革音，寇盜屏跡，境內大治。」¹³⁵由此可見，楊文逸應該也受到楊家家風的影響，兼習武事。楊澄之子楊徽之「始在童丱卓然不羣，結髮從師刻苦為學」，曾經問學於建州著名學者江文蔚(901-952)與江為，¹³⁶後來更成為家族中首位進士及第者，這不僅對楊家由武轉文的轉型有很大的影響，也鼓舞其他家族成員。楊徽之從弟楊參亦曾跟他一起到廬山學舍問學。¹³⁷然而，在十

頁 143；劉敞，〈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 60 冊，頁 5。

¹³² 蘇頌，《蘇魏公文集》，卷 51，〈碑銘·楊公神道碑銘并序〉，頁 765。

¹³³ 楊億，《武夷新集》，卷 8，〈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頁 135。

¹³⁴ 楊億，《武夷新集》，卷 7，〈序·送倚序〉，頁 126。

¹³⁵ 楊億，《武夷新集》，卷 8，〈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頁 136。

¹³⁶ 楊億，《武夷新集》，卷 11，〈行狀·楊公行狀〉，頁 180。

¹³⁷ 楊億，《武夷新集》，卷 11，〈行狀·楊公行狀〉，頁 180。

數位從兄弟當中，¹³⁸習文的比例並不高，目前所知僅楊文逸、楊徽之與楊參 3 例，其他從兄則多維持尚武的習氣，如楊文逸的親弟「率以豪俠自任，鮮車怒馬，輕裘緩帶，出入閭里，持吏短長，暴虎憑河，使酒難近，私匿亡命，結客報仇，人胥畏之，莫敢忤視。」¹³⁹

而章氏家族由武轉文應始於章仁嵩，其在南唐官至駕部郎中，郎中為文職，因此他應該不是以武功出仕。至章仁嵩的子姪輩從文的風氣更盛，如前所述其子章士廉官至汀州寧化縣令，而另一個兒子章公實「始委質江吳為郡文學」，明顯是以文學出仕。可見章家在五代後期已逐漸從武人世家朝士人家族發展了。張氏家族最早見於記載的文官是張仲仁，《武夷新集》載云：「君爰自童蒙，服膺儒素，韻宇冲粹，智畧縱橫。」¹⁴⁰而他後來在南唐所任官職亦多與文學儒術有關，例如他曾擔任祕書省校書郎，按校書郎在唐代是士人「起家之良選」，其入仕的條件較高，一般需進士及第或同等條件，¹⁴¹因此擔任此職的士人必定有較好的學識。而范氏家族在這段時期竟沒有任何家族成員擔任文官，從范韜的墓誌銘可以看出，其家族成員皆擔任軍職，無一例外；范韜五子范仁衛雖「脩文習武」，但是仍以右散軍將出仕。¹⁴²其實范家並無轉向文職的動機，上文已指出由於范韜很早就投降南唐，因此范家成員在南唐的仕宦甚為順利，不需要從文學途徑取得更好的出仕機會。

轉向文職的風氣在南唐兼併建州後更為明顯，還與南唐的科舉制

138 楊億，〈弟儁歸鄉〉詩云：「故侍讀尚書十五翁周顯德中登第」，可知楊徽之在從兄弟中排行第十五。見楊億，《武夷新集》，卷 2，〈詩二·弟儁歸鄉〉，頁 41。

139 楊億，《武夷新集》，卷 8，〈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頁 137。

140 楊億，《武夷新集》，卷 9，〈墓誌一·故宋陝州芮城令清河張君墓誌銘〉，頁 143。

141 參見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頁 33-54。

142 葉雲，〈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收入《全唐文補遺》，第 7 冊，頁 200。

度與廬山國學有關。如楊徽之當時見「潯陽廬山學舍甚盛，四方髦俊輻輳其間」，因此在「終二親之喪」後，「即與從父弟參，躡屩擔簞，不遠千里，亦既至止」，¹⁴³成為廬山國學的學生。張彝憲亦曾在南唐後期，「薄遊九江，講學廬阜，勵精文史」，¹⁴⁴可見廬山國學吸引不少浦城家族精英前往求學。

(三)唐宋之際浦城家族間的聯姻

這段時期另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這些家族間有密切的聯姻關係，而且延續至北宋前期。現有的資料中，楊氏家族的婚姻狀況要從楊文逸與楊徽之這一輩才開始比較清晰，楊文逸娶章仁嵩的女兒，是章得象的姑婆，在此之前楊澄的夫人就是來自章氏家族，只是不知其與章仔鈞的關係，¹⁴⁵但從輩分推測應是章仁嵩的姐妹或堂姐妹。因此直到北宋前期楊、章兩家仍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這從《武夷新集》中可以得到印證。如楊億曾贈詩給表弟章得象，提到「嘗思竹馬遊從日，又見風鵬奮擊時。執手勉君勤素業，歸來更直鳳凰池。」¹⁴⁶可知楊億與章得象二人從小一起長大，關係密切。楊億與章得象的從叔父章頤(?-1034)與章頤(1000進士)兄弟往來亦極為頻繁，《武夷新集》中有6篇是與他們唱和的詩作，¹⁴⁷此外，與楊億有往來的還有章子美、章徵君、章安世、章琮、

¹⁴³ 楊億，《武夷新集》，卷11，〈行狀·楊公行狀〉，頁180。

¹⁴⁴ 楊億，《武夷新集》，卷7，〈序·諸公寄題建州浦城縣清河張君所居池亭詩序〉，頁125。

¹⁴⁵ 蘇頌，《蘇魏公文集》，卷51，〈碑銘·楊公神道碑銘并序〉，頁768。

¹⁴⁶ 楊億，《武夷新集》，卷3，〈詩三·表弟章廷評得象知邵武軍歸化縣〉，頁52-53；卷5，〈詩五·表弟廷評章得象知信州玉山縣〉，頁76。

¹⁴⁷ 楊億，《武夷新集》，卷1，〈詩一·送章頤歸鄉〉，頁10；〈詩一·次韻和章頤見寄〉，頁13；卷3，〈詩三·章頤得解後之陝府謁嚴洪二從事(是

章羣等人。¹⁴⁸可見，透過楊澄、楊文逸與章家兩代的聯姻，五代宋初，楊、章兩家有很緊密的關係。楊家與張家則是三代聯姻，楊澄的女兒嫁給張仁邈，張仁邈的兒子張仲言娶了楊億的姑姑，另一位姑姑則嫁給張彝憲。這樣的關係延續至楊億，他的夫人是張仁邈從孫張沔(983-1060)的姐姐。¹⁴⁹從《武夷新集》亦可發現許多楊億與張家往來的詩文，¹⁵⁰楊億對於張家成員亦提攜有加，如張沔就曾從遊於楊億，「當是時楊文公以文章名一世，于公鄉里外姻也，因起從之游」；張彝憲的兒子張湜(1008進士)亦曾隨楊億「肄業上都，刻苦讀書，三餘之習無廢」。¹⁵¹可見五代

年閏十二月)》，頁 42；〈詩三·次韻和章頻下第書懷之什〉，頁 49；卷 5，〈詩五·送章頤寺丞之巴陵〉，頁 75；〈詩五·章頻宰南昌〉，頁 78。

¹⁴⁸ 楊億，《武夷新集》，卷 1，〈次韻和章子美對雪〉，頁 10；〈詩一·寄章徵君〉，頁 14；〈詩一·送章安世赴舉〉，頁 16；〈詩一·章徵君見和所寄詩再次本韻酬贈〉，頁 19；卷 3，〈詩三·章琮赴廣州東莞簿〉，頁 55；卷 5，〈詩五·章羣下第東歸〉，頁 75。按：這五人應該出身浦城，亦或同郡鄰縣的章氏族人(據《八閩通志》記載章琮為建安縣人)。

¹⁴⁹ 楊億，《武夷新集》，卷 9，〈墓誌一·故宋陝州芮城令清河張君墓誌銘〉，頁 143；卷 8，〈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頁 136-137；沈遘，《西溪文集》，卷 10，〈長壽縣太君魏氏墓誌銘〉，頁 54b。

¹⁵⁰ 楊億，《武夷新集》，卷 1，〈詩一·送張彝憲歸鄉〉，頁 11；〈詩一·題張濬所居壁(濬予之姻，此後自郡歸鄉)〉，頁 21；〈詩一·留題張彝憲池亭(彝憲昆仲三人皆好學，季弟逝矣)〉，頁 21；卷 3，〈詩三·次韻和表弟張湜秋霽之什〉，頁 48；卷 4，〈詩四·張泌東遊〉，頁 74；卷 7，〈序·送張泌之毗陵詩序〉，頁 123；〈序·諸公寄題建州浦城縣清河張君所居池亭詩序〉，頁 125 等。

¹⁵¹ 劉敞，〈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 60 冊，頁 5；楊億，《武夷新集》，卷 5，〈詩五·外弟張湜西遊〉，頁 75；卷 7，〈序·諸公寄題建州浦城縣清河張君所居池亭詩序〉，頁 125。按：楊億雖未明言張彝憲的兒子是張湜，但從〈詩序〉：「君之愛子，實吾家之宅相，而予之外弟也。往年隨我肄業上都，刻苦讀書，三餘之習無廢」，與〈外弟張湜西遊〉：「六年隨我客梁園，西上孤飛徹九門」的記載，可以推測張湜就是張彝憲的兒子。

宋初楊家與張家也有著密切的關係。楊家與谿東黃氏家族亦有姻親關係，目前所知僅楊億這一代與黃家通婚，據載黃元吉之孫黃孝先(1024進士)為楊億的外甥。¹⁵²因此，楊億與黃氏族人也多有交往，除與黃孝先的叔父黃覺，以及黃震、黃旦等同輩以詩文唱和外，也獎重提携後輩俊才，如黃鑑自幼就是楊億的門下客。¹⁵³

章氏家族除與練氏、楊氏有姻親關係外，亦與其他浦城家族通婚，如范氏家族，章仔鈞之弟大衝使(疑為章仔鈞)的女兒章十二娘嫁給范韜之子范仁通，仁通之女范二十一娘嫁入章家，其弟范仁珣則娶章琛的女兒章六娘。¹⁵⁴後兩者雖不清楚與章仔鈞的關係，但是為浦成章氏的可能性很大，可以推測章家與范家在王閩、南唐時期曾經相當密切。章氏與張氏家族也是兩代聯姻，張仲仁先娶「武寧章氏」，其女後嫁給章覃，堂弟張瓌(?-990，張沔之父)的妻子也是出身章家。¹⁵⁵然其他文獻上並無這三人的相關資料，因此無法得知兩人在浦成章氏中的世系關係。

除了與楊家、章家聯姻，張氏家族早期也曾與范家通婚，張仲仁的祖母(夫張贊[斌])就是范韜的妹妹，而范韜妻子張九娘的父親任職臨江鎮判官，可能也是出身仁風里的張氏家族。¹⁵⁶從范韜的墓誌銘中，還可以看到范韜家族與黃氏、周氏的婚姻關係，雖並不清楚這些人的

¹⁵² 周必大，〈朝請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黃公子游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232冊，頁274。

¹⁵³ 劉摯，《忠肅集》，卷14，〈墓誌銘·潛山黃先生墓誌銘〉，頁285-286；楊億，《武夷新集》，卷3，〈詩〉，頁45-46；卷4，〈詩·格律詩〉，頁66、69-70；宋庠，《元憲集》，卷35，〈序·談苑序〉，頁370-371。

¹⁵⁴ 葉雲，〈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收入《全唐文補遺》，第7冊，頁200。

¹⁵⁵ 楊億，《武夷新集》，卷9，〈故宋陝州芮城令清河張君墓志銘〉，頁144；沈遵，《西溪文集》，卷10，〈長壽縣太君魏氏墓誌銘〉，頁54b。

¹⁵⁶ 葉雲，〈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收入《全唐文補遺》，第7冊，頁200。

背景，但其中有部分可能是出身浦城當地。¹⁵⁷

這些聯姻現象顯示早期浦城地方豪族的社會關係主要在浦城當地，婚姻圈也就只能建立在浦城。但隨著家族成員仕宦於王閩與南唐政權，各家族開始與其他地區的官宦社群交流往來，婚姻網絡也開始擴大，不再侷限於浦城的地方家族。例如范韜投靠南唐後，幼子范元衛於撫州出仕，並娶當地豪強危全諷(?-909)的曾孫女危十一娘。¹⁵⁸入宋以後，情況更為明顯，由於在科舉考試上的成功，許多家族成為遊宦各地的士人家族，並遷居其他城市，甚至是都城開封。進而廣泛接觸其他地區的士人社群，以至於全國精英士人社群，其婚配的對象也隨之改變。以張氏家族張靄一系為例，在張沔以後，婚姻網絡就開始改變，張沔後來徙居吳縣，其子孫輩沒有一位與浦城家族有婚姻關係，其婚姻對象有以東南士人社群為主的傾向。¹⁵⁹而吳待問家族則遷居鄰近開封的新鄭，其子孫輩的婚姻網絡也隨之轉變，由於長子吳育與四子吳充先後位至宰執，他們子女的婚姻對象明顯以聚居開封的宰相後人為主，成為宰執家庭婚姻網絡的一部分。¹⁶⁰可見政治地位的提升對士人社群婚姻網路有顯著的影響。¹⁶¹

157 葉雲，〈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收入《全唐文補遺》，第7冊，頁200。按：前者有大夫黃澹、黃艱女、黃績女三娘與荀後將黃懷男仁用；後者有勾押周曜與周沖。

158 葉雲，〈大唐范司空府君墓誌銘并序〉，收入《全唐文補遺》，第7冊，頁200。

159 張沔娶婺源魏羽之女，長子張諷娶新喻劉攸之姐，五女先嫁永康胡湘、後嫁新昌石元之，長孫女嫁錢塘沈遠，三子張諷的長女嫁山陰褚理。

160 吳育的大女婿韓宗彥為韓億之孫，二女婿龐元英為龐籍之子，吳充長媳為呂端曾孫女，二媳為王安石長女，大女婿歐陽發為歐陽修長子，二女婿呂希績為呂公著次子，四女婿為文彥博六子。此七人皆曾位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或參知政事。

161 張沔與吳待問家族的婚姻網絡可以呼應柏文莉(Beverly J. Bossler)與陶晉生的觀點，相關討論請參見 Beverly J. Bossler, *Powerful Relations: Kinship*,

五、北宋前期浦城士人家族的形成

宋初為修正唐末以來重武輕文之風，對科舉極為重視，太宗時即開始大幅增加科舉及第人數。這對宋代的家族社會產生極大影響，因為科舉既成為入仕的重要途徑，如果一個家族要維持其官宦地位，就必須要不斷有人進士及第。因此，從宋初以來，就有大批士人投入科考。而大部分家族也都積極培養子弟從事舉業，以期能進士及第，光宗耀祖，延續家族的政治社會地位，這樣的現象也出現在浦城的地方家族。開寶八年(975)，建州成為宋朝版圖，浦城家族面臨新的局勢，那些在南唐政權中任官的家族，如何在宋朝治下仍維持原來的政治地位？面對一個重文輕武的大一統王朝，科舉考試顯然是這些家族維持政治生命唯一的道路。事實上，由於宋廷的猜忌，南唐舊臣的仕途備受歧視，所受新職通常較舊職為低，升遷亦極為困難，而參加科舉考試取得科名成為改善仕途主要途徑。¹⁶²因此身為南唐舊臣的浦城家族為了仕途就不得不投入科考。據筆者統計，北宋前期(太祖至仁宗)浦城所在的建州進士人數迅速攀升(見附表1)，其中就有許多是出身前述浦城地方豪強家族。

(一)楊氏

在所有浦城家族之中，楊家是較早在科舉中取得成果的家族，楊徽之是重要的開創者。他從年輕時就「刻苦為學」，曾經前往廬山國學肄業，後周顯德元年(954)，「潛服間道達於汴洛，贄文公卿間」，

Status, &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960~1279), 78-94;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頁101-135。

¹⁶² 伍伯常，〈北宋選任陪臣的原則——論猜防政策下的南唐陪臣〉，頁16-26。

隔年登進士第，¹⁶³成為楊家首位進士及第的成員。楊徽之先後在後周與宋朝仕宦，於太宗時開始受到重用，官至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祕書監。其為人雖「性介特，人罕能入其意者，雖親子弟，不肖不為奏任為官」，¹⁶⁴但對於努力向學的家族成員仍提攜有加，如從姪楊自牧(誠)登太宗端拱二年(989)進士，¹⁶⁵是楊徽之少數奏任為官者，「平生獨奏外孫宋綬、族人自誠及某三人而已」。¹⁶⁶而楊億亦曾受楊徽之的幫助與提攜，楊億在父親過世時，年紀尚幼，「從祖徽之知許州，往依焉，徽之閒與語，歎其學問該博，曰：『興吾門在汝矣。』……徽之在襄，即幕下書疏一以委億。」¹⁶⁷南唐滅亡後，宋廷曾欲徵召楊億之祖楊文逸入朝任官，後來因病而留在浦城，不久於太平興國三年(978)病逝於家中。¹⁶⁸

楊億父執輩(遷居浦城第八代)成員頗多，然多未留下資料，其中楊自牧在所有從兄弟中排行第十六，是楊家第二位進士及第者。另外，楊億的父親「博涉藝文，尤深左氏」，亦精通儒學，然因楊文逸晚年生病在家，他因「終鮮弟兄，烝烝就養，不離左右」，也就一直待在家鄉，於雍熙四年(987)過世。

到了楊億這一輩(第九代)，楊家在舉業上有進一步突破，其中以楊億的表現最為突出。楊億出生前夕，祖父楊文逸「前得吉夢，謂必興吾

¹⁶³ 蘇頌，《蘇魏公文集》，卷 51，〈碑銘·楊公神道碑銘并序〉，頁 766；

楊億，《武夷新集》，卷 11，〈楊公行狀〉，頁 181。

¹⁶⁴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 2，〈楊徽之〉，頁 31。

¹⁶⁵ 「自誠子偉，仕至翰林學士。」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 2，〈楊徽之〉，頁 31。「近年楊偉父名自牧，為羣牧使，皆曾固辭。」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93，〈仁宗九十四〉，嘉祐六年五月條，頁 4671。

¹⁶⁶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 2，〈楊徽之〉，頁 31。

¹⁶⁷ 曾鞏撰，王瑞來校證，《隆平集校證》，卷 13，〈待從·楊億〉，頁 387。

¹⁶⁸ 楊億，《武夷新集》，卷 8，〈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頁 136。

門」，因此一出生就受到祖父的鍾愛，「纔免襁褓，教以詩書」，¹⁶⁹母親亦扮演重要角色，「能言，母口授以孝經，隨即記誦。六歲學吟詩，七歲善屬文」。¹⁷⁰雍熙元年(984)，太宗聞其名，下詔遣赴闕，「以童子召對」，授祕書省正字，¹⁷¹後任官至工部侍郎、翰林學士。楊億的學問相當淵博，「於歷代典章制度尤為該洽」，「經傳子史百家之學罔不通貫」，與王欽若等同修《冊府元龜》與《太宗實錄》。他在文學上的影響力更大，創西崑體，「後學多所法則」，為北宋初年的一代文宗。¹⁷²楊億除關照楊氏家族的後輩外，對於鄉里姻親也提攜有加，如姻親張沔「始以孤童從楊文公遊京師」，¹⁷³「當是時楊文公以文章名一世，于公鄉里外姻也，因起從之游，游楊氏之門者常數十百人」，章得象、張湜、吳待問與黃鑑等人皆曾為門下客。¹⁷⁴楊億親弟楊倚，於景德二年(1005)登進士乙科。¹⁷⁵從弟楊偉「幼學於億」，於天禧元年(1017)獻賦頌於朝廷，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¹⁷⁶後亦官至翰林學士。另外一位從弟楊儀，則於天聖五年(1027)進士及第。可見到了楊億這一代(共4人進士及第)，浦城楊氏已經轉型為士人家族了。

¹⁶⁹ 楊億，《武夷新集》，卷8，〈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頁137。

¹⁷⁰ 曾鞏撰，王瑞來校證，《隆平集校證》，卷13，〈待從·楊億〉，頁387。

¹⁷¹ 曾鞏撰，王瑞來校證，《隆平集校證》，卷13，〈待從·楊億〉，頁387。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5，〈太宗八〉，太宗雍熙元年十一月癸酉條，頁589-590。

¹⁷² 曾鞏撰，王瑞來校證，《隆平集校證》，卷13，〈待從·楊億〉，頁388-389。

¹⁷³ 沈遼，〈張司勳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79冊，頁249。

¹⁷⁴ 劉敞，〈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60冊，頁5；章炳文，《搜神秘覽》，卷上，〈楊文公〉，頁111。

¹⁷⁵ 楊億，《武夷新集》，卷7，〈序·送倚序〉，頁127。

¹⁷⁶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89，〈真宗四十七〉，天禧元年夏四月壬午條，頁2055。

(二)章氏

章氏家族在北宋前期亦逐漸轉型為士人家族，「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眾」，¹⁷⁷表現極為突出。章士廉之子章奂「志耿介，以儒術發聞」，然「不樂進取，試禮部一不中即謝去」。¹⁷⁸章公實在南唐曾任郡文學，入宋後，曾多次赴京參加貢舉，但「凡累詣貢部，皆敗於垂成」。¹⁷⁹顯見章仁嵩這一系在宋初的科場上並不成功。而章奂的從兄弟章頻與章頤(非章仁嵩一系)卻先後於景德二年與咸平三年(1000)登進士第。¹⁸⁰另一從兄弟章可法(章仔釗曾孫)則於景德二年中進士甲科。¹⁸¹

章仁嵩裔孫至章得象這一代始有突出的表現，章得象自「孩提已自秀挺，卬能屬文，年十二，侈袂挾策，與密公及從兄得一俱稱茂才」，¹⁸²後與章得一分別於咸平五年(1002)與咸平三年登進士第。章得象仕途頗為順遂，於仁宗時官至宰相，成為首位任相的浦城人。步入仕途後，章得象曾提攜他的後輩，例如姪子章望之「用從父得象蔭為校書郎、監杭州茶庫」，¹⁸³從姪章棗(1027-1102)「始以世父得象蔭為將作監主簿」。¹⁸⁴然而當他位至宰執後，態度就明顯轉變，《隆平集》

177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9，〈章太傅夫人練氏〉，頁177。

178 宋祁，《景文集》，卷59，〈誌銘·文憲章公墓誌銘〉，頁785。

179 楊億，《武夷新集》，卷7，〈送四十舅翁東遊詩序〉，頁120。

180 按：章頻、章頤為章仔鈞的後代，然章仔鈞如何傳至章頻、章頤則不清楚，但從他們與章得象關係不甚密切看來，他們應非章仁嵩之後。

181 楊時，《楊龜山先生全集》，卷35，〈誌銘六·章端叔墓誌銘〉，頁1a；范成大，《吳郡志》，卷26，〈人物七〉，頁384。

182 宋祁，《景文集》，卷59，〈誌銘·文憲章公墓誌銘〉，頁785。

183 王偁，《東都事略》，卷115，〈文藝傳·章望之〉，頁1007。

184 王偁，《東都事略》，卷97，〈章棗傳〉，頁831。

記載章得象「居相位八年，親戚子弟皆抑而不進」¹⁸⁵，前述因章得象蔭任而出仕的章望之，後來「舉賢良」時，因「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遂不復仕。」¹⁸⁶可知章氏家族沒有因章得象位居宰相而得到太多利益。章得象的從兄弟中還有章俞(1001-1088，非章仁嵩一系)於景祐三年(1034)登進士第，章俞的兒子就是著名的新黨大臣章惇(1035-1106)。

到章得象下一代，章家在科場上的表現又出現變化，章仁嵩一系竟無人登進士第。而其他支系則有不少人中舉，章頻的孫子章棫登天聖八年(1030)進士第，章俞之子章惇於嘉祐四年(1059)登第，還有章訢於慶曆六年(1046)登進士第，這三位是屬於章仔鈞一系。由上述可知章家在北宋前期已成功的轉型為士人家族了，連續三代皆有家族成員登第(共計9人)。

(三)張氏

入宋以後，張氏家族也開始積極參加科舉，朝士人家族轉型。曾在南唐任官的張仲仁，在南唐滅亡後，入宋為官，然其官職多是地方主簿、縣尉與縣令。而尚未入仕的同輩從兄弟則開始進出科場，以求取得功名進入仕途，其中，張彝憲「昆仲三人皆好學」，張彝憲雖三試禮部不利，然其弟張彝叙與張正符(?-999)先後在雍熙二年(985)與淳化三年(992)中舉。¹⁸⁷

¹⁸⁵ 曾鞏撰，王瑞來校證，《隆平集校證》，卷5，〈宰臣·章得象〉，頁180。

¹⁸⁶ 王雱，《東都事略》，卷115，〈文藝傳·章望之〉，頁1007。

¹⁸⁷ 按：《宋登科記考》依明清方志將張彝叙與張正符皆視為建安縣人，然據楊億的記載，張彝憲的仲弟於雍熙二年舉進士中乙科，「淳化三年季弟隨計偕，列高等」，咸平三年時季弟已逝。而據《麟臺故事》的記載，咸平二年張正符「入館校勘」，「未卒業而死」。可以推斷張彝叙與張正符為張彝憲的仲弟與季弟，其籍貫應為浦城。參見楊億，《武夷新集》，卷1，〈留題張彝憲池亭(彝憲昆仲三人皆好學，季弟逝矣)〉，頁21；卷7，〈序·

到了下一代，張仲仁與張彝憲的子姪輩亦陸續投身科舉，張仲仁之子張為舟曾「舉進士」，後於景德二年以特奏名賜同進士出身。¹⁸⁸堂姪張沔(張靄之孫)「少長發其家書，讀之勤志強力，期以文學成名」，後來遊學於鄉里姻親楊億的門下，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中進士甲科。張彝憲之子張湜也曾隨楊億刻苦讀書，亦於大中祥符元年登第，另一個兒子張泌則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進士。¹⁸⁹

張沔一系後來成為典型的士人家族，張沔的子孫輩多習舉業，屢有進士及第者。長子張諷「少明雋好學，有器識」，後以蔭任出仕。諷子張元方熙寧六年(1073)進士及第，張元振、張元憲與張元舒皆曾「舉進士」。¹⁹⁰次子張詵(1016-1087)登寶元元年(1038)進士第，三子張誨「不預人事，以其餘力讀書，夜不半不寐」，在家族支持下，全力修習舉業，然而卻「數拔進士，薦不中第」，誨子張元載、張元恪、張元均皆「舉進士」。¹⁹¹可見入宋以後張家就迅速的投入科舉，極力培養子弟讀書，轉型為士人家族。

諸公寄題建州浦城縣清河張君所居池亭詩序》，頁 125。程俱撰，張富祥校證，《麟臺故事校證》，殘本卷 2 中，〈書籍〉，頁 259；李一飛，《楊億年譜》，頁 60-61；傅璇琮主編，《宋登科記考》，頁 28、41。

¹⁸⁸ 黃仲昭修纂，《八閩通志》，卷 49，〈選舉·科第〉，頁 121。按：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6，〈真宗四〉，咸平三年三月甲午條：「又試進士五舉、諸科八舉及嘗經御試或年踰五十者論一篇，得進士二百六十人，諸科六百九十七人，賜同出身及試校書郎、將作監主簿。」張為舟是因累舉不第，還是年踰五十，史無明文，然從張仲仁的生卒年(939-1000)推算，張為舟在景德二年可能已經年踰五十。

¹⁸⁹ 劉敞，〈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 60 冊，頁 5；黃仲昭修纂，《八閩通志》，卷 49，〈選舉·科第·建寧府〉，頁 173；卷 64，〈人物·建寧府〉，頁 695。

¹⁹⁰ 沈遼，〈張司勳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 79 冊，頁 252。

¹⁹¹ 沈遼，〈宋太子中舍張傳師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 79 冊，頁 243。

(四) 吳氏

吳氏家族向士人家族的轉型則呈現明顯的落差。早期貧窮而勢孤的吳待問家族，在北宋前期的科舉考試中表現極為優異，且多位至顯宦。因「少孤貧賤」而為鄉里同輩所輕視的吳待問，曾在楊億門下學習，為其所厚遇，於咸平三年次舉登第，¹⁹²從此改變家族的命運。其後諸子皆登進士第，天聖五年，長子吳育、次子吳京、三子吳方同時進士及第，其中吳育試禮部第一名，中進士甲科，吳氏兄弟遂「名聞天下」。幼子吳充則於寶元元年登進士第，「試武成王廟亦第一」（即禮部試）。父子兩代共五人進士及第，後來在官場升遷上也頗為順遂，吳待問官至禮部侍郎，吳育與吳充則「相繼登相府」，前者在慶曆五年(1045)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後者於熙寧九年(1076)代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¹⁹³只過了兩個世代，吳待問家族不僅成功轉型為士人家族，更成為顯赫一時的官宦之家。

相對而言，五代宋初曾為地方官宦之家的吳輔堯家族，在北宋前期的轉型較遲且成效不佳，這與吳輔堯之父吳朴的經歷有關。吳朴並未如父祖出仕任官，反而為「權貴者誣構，而卒于獄」，這對吳輔堯的生涯造成衝擊，他「以家難廢學」，轉而「治家事產業」，以求自立。對此吳輔堯「頗為自恨」，因此「力帥諸子出就師友」，全力支持下一代求學以投身科舉，三子吳道曾在慶曆年間從學於剛登第的浦

¹⁹² 章炳文，《搜神秘覽》，卷上，〈楊文公〉，頁111；孫升口述，劉延世筆錄，《孫公談圃》，卷上，〈吳待問老母葬地〉，頁105。

¹⁹³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33，〈墓誌·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公墓誌銘〉，頁486-488；李清臣，〈吳正憲公充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79冊，頁55-57。

城縣主簿陳襄，吳誠、吳詡、吳道與吳詳等諸子皆曾「舉進士」，¹⁹⁴但一直到吳輔堯死後，吳道才成功登第(嘉祐八年，1063)。¹⁹⁵可見吳朴、吳輔堯父子的境遇嚴重影響家族的發展進程。

(五)黃氏

谿東黃氏家族在入宋以後很快就投入科考，並成功轉型為士人家族。這與曾仕宦於南唐的黃元吉有關，他本身「有詩名」，並以「儒學傳家」，於是善詩與舉業並成為家族的傳統。兩個兒子很早就投身科考以求仕進，後皆登進士第，次子黃覺「場屋蹉跎二十年」，先於景德二年登第，其「詩益有名」，多與楊億、劉筠(970-1030)、章德象、宋綬(991-1040)等人唱和；長子黃觀則於大中祥符元年中進士甲科。¹⁹⁶

此後家族「世寢以顯，多登儒科」，黃觀之子黃孝先「尤深於詩」，天聖二年(1024)進士及第；黃覺後徙居舒州太湖縣，其子黃孝綽「少舉進士，兩至禮部」，然皆不利，後隱居不復起，¹⁹⁷黃孝恭則於天聖八

¹⁹⁴ 陳襄，《古靈先生文集》，卷 25，〈墓誌銘·吳君唐卿墓誌銘〉，頁 15a。

¹⁹⁵ 按：《宋登科記考》所收吳道有兩人，一是據明清方志所載，嘉祐八年進士，建安縣人，一是據《宋元學案》，闕年登進士第，字真常，浦城縣人。陳襄〈與太原韓丞相手書〉中，共推薦「新汝州葉縣尉吳道」等 17 人，韓丞相應指韓琦，嘉祐六年(1061)至治平四年(1067)為同平章事，吳道應在這段時間內登第，疑二者為同一人。陳襄，《古靈先生文集》，卷 8，頁 5b；傅璇琮主編，《宋登科記考》，頁 269、1834。

¹⁹⁶ 劉摯，《忠肅集》，卷 14，〈墓誌銘·潛山黃先生墓誌銘〉，頁 286；楊傑，〈故朝奉郎知汝州黃府君行狀〉，收入《全宋文》，第 75 冊，頁 248；周必大，〈朝請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黃公子游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 232 冊，頁 274。

¹⁹⁷ 韓元吉，〈中奉大夫直敷文閣黃公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 216 冊，頁 267；周必大，〈朝請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黃公子游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 232 冊，頁 274；劉摯，《忠肅集》，卷 14，〈墓誌銘·潛山黃先生墓誌銘〉，頁 286。

年登進士第，亦善詩，為宗袞、宋祁與宋庠等人所賞識。¹⁹⁸這還延續到下一代，黃孝先後來「卒官博州，貧不能歸，卜葬陳之宛邱，……子孫遂家宛邱」，¹⁹⁹其子黃好謙與黃好信皆登進士第；²⁰⁰黃孝綽之子黃莘亦中舉。²⁰¹家族三代皆有成員進士及第(共 7 人)，是典型的科舉家族。

(六) 周氏與范氏

周氏家族則最晚轉型為士人家族，據周武仲墓誌銘，從周武仲的高祖以降，「皆以儒學行義稱于鄉邦」。但直到其祖父才開始投入科考，曾「累舉進士」，並「以文學教授鄉里」。到了周武仲的父執輩，始陸續有家族成員進士及第，其父「以進士起家」，叔父周常登熙寧六年進士，周武仲本人則於紹聖四年(1097)進士及第。²⁰²直到北宋中期才轉型為士人家族。

而范氏家族入宋以後就不見記載，從范韜的墓誌銘看來，到南唐統治時期，范家仍然以武功出仕，尚未朝文職轉變。亦即直到南唐滅亡前夕，大多數范家成員還在南唐軍中，擔任中下層武將。這對范氏

¹⁹⁸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中，頁 23。按：《宋登科記考》據明清方志以黃孝恭為建安縣人，然從黃孝恭為黃孝先的從弟，以及黃孝恭善詩，可以推測黃孝恭為黃元吉之後，而元吉僅有兩子，黃孝恭應為黃覺之後。傅璇琮主編，《宋登科記考》，頁 140。

¹⁹⁹ 周必大，〈朝請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黃公子游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 232 冊，頁 274。

²⁰⁰ 傅璇琮主編，《宋登科記考》，頁 320；周必大，〈朝請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黃公子游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 232 冊，頁 274。

²⁰¹ 汪應辰，〈黃公墓誌銘〉，收入《全宋文》，第 215 冊，頁 243。按：黃陞為黃莘弟黃藝之子。

²⁰² 楊時，《楊龜山先生全集》，卷 36，〈誌銘七·周憲之墓誌銘〉，頁 2b。

家族非常不利，因為南唐滅亡以後，宋廷對於南唐武人與軍隊極為猜防，地方精兵被集中開封重新整編，許多將領也被安置於開封，不准返鄉。²⁰³可以推測范氏家族應該被遷離了浦城，成為中央禁軍，因此在北宋前期，范家無緣參與科舉以轉型為士人家族。

這從北宋前期建州科舉各姓氏的統計(附表2)也可以得到印證，楊氏、章氏、張氏、吳氏與黃氏皆是較早出現進士且人數持續上升的姓氏，與上述浦城楊氏、章氏、張氏、吳氏與黃氏在科舉的發展相合，這些家族是推動建州在北宋前期迅速成為科舉發達地區的主要力量之一。而周氏與范氏則一直要到仁宗朝才有進士出現，科考表現遠落後於其他姓氏。

雖然進入宋代以後，大部分家族均已轉型成為士人家族，各家族的地方武力早已不復存在，但豪橫風氣仍未有多大改善。南唐後期楊徽之的從兄弟，楊億的叔公、伯公輩仍「率以豪俠自任」，甚為「剛悍」。雖以豪俠為名，實際上做的是挾其家族勢力以武力凌虐鄉里之事：「鮮車怒馬，輕裘緩帶，出入閭里，持吏短長，暴虎憑河，使酒難近，私匿亡命，結客報仇，人胥畏之，莫敢忤視」。²⁰⁴這樣豪橫的風氣到了宋代轉而依恃家族在科舉仕途上的成功，對地方長官形成嚴重壓力，浦城在北宋時期屢次被點名，「號為難治之處」，²⁰⁵原因即在於當地多大族，仁宗慶曆年間，陳襄到浦城任官時，當地「多世族，侵擾請託，以撓法敗政為常」。²⁰⁶而〈陳先生祠堂記〉亦云：

世以浦城為難治者，數大族在焉。其仕於朝者累百，而姻婭在宦途者倍之。子弟為士、為農不知其數也。挾權營私，虐其閭里，

²⁰³ 伍伯常，〈北宋選任陪臣的原則〉，頁3-5、8。

²⁰⁴ 楊億，《武夷新集》，卷8，〈表·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頁137。

²⁰⁵ 陳襄，《古靈先生文集》，卷16，〈奏狀·選差京朝官知縣狀〉，頁7a。

²⁰⁶ 孫覺，〈先生墓誌銘〉，收入《古靈先生文集》，附錄，頁11a-11b。

千請州郡，以迫縣吏，使不能自存以立其政者，歲常有之。²⁰⁷
可見雖因北宋科舉制度的影響，家族多已轉型成士人家族，武質特色相形減弱，但是這些士人家族在家鄉的成員卻仍延續過往豪橫的風氣「挾權營私，虐其閭里」，危害程度不下於先前以武力凌虐閭里。

六、結語

南方士人社群的崛起是「唐宋變革」研究中最受到關注的現象之一，這些士人的家族背景及其發展脈絡也就成為考察唐宋社會變革無法迴避的課題。作為南方士人家族中較早嶄露頭角，且發展較為興盛的地域，唐末宋初浦城家族的演變展示了一個南方士人社群崛起的實例，無疑是理解南方社會變遷的合適個案。另一方面，由於浦城位處閩地的最北端，為進出閩地的交通要道門戶，是移民遷徙入閩最可能會先接觸的地域。唐宋之際浦城主要家族的淵源背景，很大程度可以反映南方社會中移民與土著的實際狀態。

透過本文的考察，唐宋之際崛起的 7 個浦城地方家族，並非安史亂後來自北方的移民，而是當地土著或來自鄰近浙贛地區的移民，他們之間有密切的聯姻關係。唐後期，他們是根植於土地墾殖的州里豪右，具有強烈的豪強性格，進而成為唐末地方自衛武力的主導者，最終為王閩政權所吸收，大多成為浦城或建州地方軍的武將。南唐取得建州後，除了范氏之外，其他家族已開始由武轉文，主要擔任地方文官。入宋以後，由於朝廷的重文政策與對南唐舊臣的猜忌，浦城家族紛紛投入科舉考試，朝士人家族轉型，其中楊、章、張、吳、黃氏等家族很快在北宋前期就成功轉型為士人家族，周氏家族要到北宋中期才轉型，而范氏家族

²⁰⁷ 劉彝，〈陳先生祠堂〉，收入《古靈先生文集》，附錄，頁 19b-20a。

則由於南唐武人的身分無緣成為士人家族。唐末宋初浦城家族的發展脈絡其實反映的是南方土著豪族朝士人家族演變的過程。

日本學者山崎覺士在考察唐末浙西、浙東地域所見的武裝勢力後，指出浙東地區受黃巢之亂的影響，流賊流入盤據州縣城，地方有力者多逃避於山間組織自衛武裝勢力，這些山間立寨只是個別、分散地存在，並未形成聯合的武裝勢力。²⁰⁸然而從上述的考察可以發現，與浙東丘陵山區地形條件相似的浦城縣，在唐末並沒有出現類似的情況，反倒是地方武裝勢力多集中在交通要道上的河谷盆地，而且他們之間也構築密切的婚姻關係，雖未聯合成強大的武裝勢力，也非一盤散沙。而同樣位在丘陵山區的撫州南城縣，在唐末則出現一個以危全諷家族為核心，整合縣境曾、朱、黃氏等家族的強大武裝勢力，²⁰⁹進而盤據撫州，逐鹿江西。顯然唐末南方各地的武裝勢力存在不同的發展模式。²¹⁰值得注意的是危全諷勢力中的曾氏就是北宋南豐曾氏家族的祖先，楊吳攻滅危全諷後，家族沉寂了一段時間，到了南唐後期，家族已由武轉文，是時曾鞏的祖父曾致堯以文學知名，但「不就鄉里之舉」，入宋後隨即參加科舉，於太平興國八年(983)進士及第，家族很快就轉型為士人家族。²¹¹其發展脈絡頗同於浦城楊、章、張、黃等家族，可見唐宋之際浦城家族的發展並非特例，南方其他地區應該也存在類似的情況。

208 山崎覺士，〈唐末杭州における都市勢力の形成と地域編成〉，頁 205-229。

209 吳修安，〈唐宋時期鄱陽湖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頁 207-209。

210 按：可能由於史料的缺乏，山崎覺士對唐末浙東山間立寨的考察主要引用《讀史方輿紀要》的 9 則記載(武強山、千頭湖、寨溪、松山、烏舞巖、黃龍山、金石巖與玉巖山)，無法據以了解該地域家族的發展脈絡。

211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 21，〈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并序〉，頁 328；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 92，〈墓誌·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頁 950；吳修安，〈唐宋時期鄱陽湖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頁 251-252。

長期以來，學界對安史之亂以降南方社會的變遷，大多強調北方移民的影響，但從上述分析可知，南方社會的變遷其實由土著家族主導的因素更大。他們是北宋士人家族的主要來源之一，特別是北宋前期崛起的士人家族。浦城的例子顯示，從晚唐到北宋前期，地方大族大多經歷了由地方豪強到士人家族的轉變——從以財力稱雄鄉里的地方豪族(唐末以前)、經地方自衛武力的領袖(唐末)、地方軍將領(王閩)、地方文官(南唐)，到以科舉出仕的士人家族(北宋前期)。其中楊、章、張、吳與黃氏等 5 個家族還被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 1932-1996)列入北宋 35 個專業精英家族(professional elite)之中，²¹²其比例之高突顯浦城士人家族在官場上的重要分量，而這與他們家族在唐宋之際的經歷及北宋前期的科舉表現密切相關。

誠然如同郝若貝與韓明士(Robert P. Hymes)的研究所強調，²¹³北宋前期的浦城進士大多出身地方大族，而非一般平民。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貧窮而勢孤的吳待問家族藉由科舉翻身的實例。吳待問在登第之前既無家族庇蔭，亦無姻親援助，有的只是鄉里前輩楊億的提攜；雖然依照韓明士的標準，吳待問已藉由和楊億的師生關係匯入地方精英網絡，²¹⁴但從鄉里同門章得象和黃鑑對他的輕視，吳待問與地方精英網絡的關聯無疑是薄弱的。到了下一代，吳待問的 4 個兒子皆中進士(其中 2 位禮部試第一)，2 人登相位，並藉此成功匯入北宋宰執家族的婚姻網絡，孫子輩至少有 7 人的婚嫁對象出身宰執家族，婚宦之貴盛，其他浦城

212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405-416.

213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416-420;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29-81.

214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42.

家族無人能出其右。這反映家族的來源背景並非仕途成功的必要條件，科場上的表現才是主要因素。此外，楊、章、張與黃氏等家族的聯姻是建立在同一鄉里且有共同背景的基礎之上，其關係早在北宋以前就已經建立。北宋前期若干婚嫁的存在恐怕只是先前姻親關係的延續，而非如郝若貝認為的是成為專業精英家族後彼此加強聯盟的手段。²¹⁵其實這些家族在科舉成功後的婚姻對象，更多的是浦城以外的全國士人社群(主要為東南與聚居開封的士人社群)。就此而言，科舉的意義是否只是進一步確認地方精英原本的社會地位，恐怕有待商榷。²¹⁶

(本文於 2018 年 7 月 17 日收稿；2018 年 11 月 22 日通過刊登)

*本文最初為臺大「宋代科舉社會」課程的學期報告，後經大幅增補修改，曾在 2017 年 6 月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主辦的「第八屆區域史地暨應用史學學術研討會」宣讀。期間先後承蒙梁庚堯、廖幼華與陳弱水教授等多位師長的提點建議，復得兩位匿名審查人與《新史學》編輯委員會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215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411-412.

216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w,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53.

附表 1 晚唐至北宋前期閩西北地區進士及第人數統計表

	晚唐五代(841-961)	太祖 (961-976)	太宗 (977-997)	真宗 (998-1022)	仁宗 (1023-1063)
建州	5	3	23	65	197
南劍州		0	8	9	32
邵武軍		0	3	4	28
合計	5	3	34	78	257

說明：《宋登科記考》中的進士名錄，大部依據地方志收錄，而明清建州方志所載宋代進士的縣籍貫與宋代文獻記載有許多不同，尚待考證，無法據以統計各縣進士人數，故仍以州、軍為單位進行統計。

資料來源：本表依據傅璇琮主編的《宋登科記考》統計。

附表 2 北宋前期建州地區進士及第姓氏人統計表

	太祖 (961-976)	太宗 (977-997)	真宗 (998-1022)	仁宗 (1023-1063)	合計
楊氏	1	3	3	12	19
章氏	0	2	16	18	36
張氏	0	4	6	17	27
范氏	0	0	0	1	1
吳氏	2	1	4	19	26
黃氏	0	1	11	26	38
周氏	0	0	0	2	2
合計	3	11	40	95	149

資料來源：本表依據傅璇琮主編的《宋登科記考》統計。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不撰著人編，《錦繡萬花谷·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2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方大琮，《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89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正德八年族孫方良節刊本。
- 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點校，《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
- 王安石撰，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臨川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
- 王偁著，孫言誠、崔國光點校，《東都事略》，收入《二十五別史》，第 13-14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0。
- 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據岑氏懼盈齋本影印。
- 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
-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 何喬遠編撰，廈門大學歷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古籍整理研究所《閩書》校點組校點，《閩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 佚名，《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4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吳剛主編，《全唐文補遺》，第 7 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 宋祁，《景文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1872-1883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
- 宋庠，《元憲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1868-1871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
- 宋敏求撰，誠剛點校，《春明退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李心傳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 李葆貞修，梅彥駒等纂，《(順治)浦城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31 冊，北京：中國書店，1992，據順治八年[1651]刊本影印。
- 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等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3。
- 沈邁，《西溪文集》，收入《沈氏三先生文集》，四部叢刊第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36，據上海涵芬樓借印浙江省立圖書館藏明覆宋本影印。
- 沈遼，《雲巢編》，收入《沈氏三先生文集》，四部叢刊第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36，據上海涵芬樓借印浙江省立圖書館藏明覆宋本影印。
- 周天遊輯注，《八家後漢書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林寶撰，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
- 茅坤撰，張大芝、張夢新點校，《茅鹿門先生文集》，收入茅坤撰，張大芝、張夢新點校，《茅坤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 夏玉麟、汪佃修纂，吳端甫、許友泉、蔡偉續點校，《建寧府志》，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
- 孫升口述，劉延世筆錄，楊倩描、徐立群點校，《孫公談圃》，收入《丁晉公談錄(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12。
- 徐紘編，《明名臣琬琰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5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翁天祐修，翁昭泰纂，《(光緒)浦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據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刊本影印。
- 馬令撰，李建國校點，《南唐書》，收入《五代史書彙編》，第 9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 馬蓉等點校，《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北京：中華書局，2004。
- 梁克家修纂，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整理(點校)，《三山志》，福州：海風出版社，2000。
- 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3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章炳文撰，儲玲玲整理，《搜神秘覽》，收入《全宋筆記》，第 3 編，第 3 冊，開封：河南教育出版社，2008。
-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陳師道撰，李偉國點校，《後山談叢》，北京：中華書局，2007。
- 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 陳襄，《古靈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87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據宋刊本影印。
-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曾鞏撰，王瑞來校證，《隆平集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
- 程俱撰，張富祥校證，《麟臺故事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0。
- 馮登府，《閩中金石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據吳興劉氏希古樓刊本影印。
- 黃仲昭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舊志整理組、福建省圖書館特藏部整理（點校），《八閩通志（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 黃恬主修，余奎元、邱文彬、蔣珍點校，《（嘉慶）新修浦城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
- 楊時，《楊龜山先生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4，據光緒癸未延平郡署刻本影印。
- 楊萬里撰，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楊億撰，《武夷新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點校本。
- 葉夢得撰，宇文紹奕考異，侯忠義點校，《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
- 路振撰，吳在慶、吳嘉騏校點，《九國志》，收入《五代史書彙編》，第6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 劉摯撰，裴汝誠、陳曉平點校，《忠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
- 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樓鑰撰，顧大朋點校，《樓鑰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 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 鄧名世撰，王力平點校，《古今姓氏書辯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 鄭炳林校注，《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
- 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 龍衮撰，張劍光校點，《江南野史》，收入《五代史書彙編》，第9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 謝維新編，《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4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蘇頌著，王同策等點校，《蘇魏公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

二、近人論著

- 山崎覺士，〈唐末杭州における都市勢力の形成と地域編成〉，《都市文化研究》，7(大阪，2006)，頁 20-33；後收入山崎覺士，《中国五代国家論》，京都：思文閣，2010，頁 205-229。
- 日比野丈夫，〈唐宋時代における福建の開発〉，《東洋史研究》，4：3(京都，1939)，頁 187-213；後收入日比野丈夫，《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京都：同朋舎，1977，頁 229-250。
- 日野開三郎，《唐末五代初自衛義軍考》，福岡：著者自刊，1984。
-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出版社，1997。
-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華書局，1983。
- 王壽南，〈唐代文官任用制度之研究〉，收於王壽南，《唐代政治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 1-132。
- 伍伯常，〈北宋選任陪臣的原則——論猜防政策下的南唐陪臣〉，《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1(香港，2001)，頁 1-31。
- 朱玉龍，《五代十國方鎮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7。
- 佐竹靖彥，〈唐宋時期福建の家族と社会——閩王朝の形成から科挙体制の展開まで〉，收入柳立言等編，《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 371-473。
- 何劍明，《沉浮——一江春水——李氏南唐國史論稿》，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 吳修安，〈唐宋時期浦城交通路線考〉，收入朱鳳玉、汪娟編，《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10，頁 397-432。
- 吳修安，〈唐宋時期鄱陽湖流域的環境變遷與地域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6。
- 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沿海與內陸的地域差異》，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
- 李一飛，《楊億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李東華，〈擾攘與新機——唐宋之際福建地區的歷史發展〉，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0，頁 475-492。
- 杜文玉，《五代十國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杜文玉，《南唐史略》，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畑地正憲，〈吳・南唐の制置使を論じて宋代の軍使兼、知軍事に及ぶ〉，《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1(福岡，1973)，頁 73-99。
- 胡阿祥，《東晉南朝僑州郡縣與僑流人口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
- 凍國棟，〈唐代閩中進士登場與文化發展管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11(武漢，1991)，頁 157-166。
- 徐曉望，《閩國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
- 浦城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浦城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4。
- 張國剛，《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
- 郭鋒，〈郡望向姓望轉化與士族政治社會運動的終結——以清河張氏成為同姓共望為例〉，《中國社會歷史評論》，3(天津，2001)，頁 74-87。
- 陳志堅，《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陳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中國社會歷史評論》，3(天津，2001)，頁 88-106；後修改收入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357-391。
-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1。
- 傅璇琮主編，《宋登科記考》，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
- 渡邊孝，〈唐代藩鎮における下級幕職官について〉，《中國史學》，11(京都，2001)，頁 83-107。
- 葛劍雄，〈福建早期移民史實辨證〉，《復旦學報》，1995：3(上海，1995)，頁 165-171。
-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 2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 鄒勁風，《南唐國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福建地圖出版社編制，《福建省地圖集》，福州：福建地圖出版社，1999。
- 趙洪章，〈浦城發現南唐范韜墓志銘〉，《福建文博》，1-2(福州，1989)，頁 74-76。
- 劉安志，〈唐五代押牙(衙)考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16(武漢，1998)，頁 62-72。
- 魯西奇，〈福建所出唐宋元時期買地券考釋〉，《閩臺文化研究》，2013：2(漳州，2013)，頁 30-42。
- 賴瑞和，〈論唐代的檢校官制〉，《漢學研究》，24：1(臺北，2006)，頁 175-208。
- 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

- 瀨川昌久，《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族·風水·移居》，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 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收入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出版社，1969，頁177-236。
- 嚴耕望，〈唐代府州上佐與錄事參軍〉，收入嚴耕望，《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454-476。
- 蘇基朗，《唐宋時代閩南泉州史地論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
- 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Bossler, Beverly J. *Powerful Relations: Kinship, Status, &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960~127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中譯見柏文莉(Beverly J. Bossler)著，劉雲軍譯，《權力關係——宋代中國的家族、地位與國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 Clark, Hugh R. *Community, Trade, and Networks: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Hartwell, Robert M.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 (Dec 1982): 365-442. (中譯見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著，易素梅、林小異等譯，〈750-1550年間中國的人口、政治及社會轉型〉，收入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姚平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175-246。)
- Hymes, Robert P.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Pucheng at the Turn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Xiu-an Wu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rise of southern China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shifts of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s, in which the evolution of Fujian from a dangerous and distant place to a prosperous region has received the most academic attention. However, reg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inland are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Fujian should be not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Jianzhou, located in the inland area, developed more slowly in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than Fuzhou and Quanzhou, located in the coastal areas. But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is trend was reversed. Especially in Pucheng, several outstanding scholars and families appeared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Therefore, study of the social changes of Pucheng at the turn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rise of Fujian. This article first examines the countryside organization of Pucheng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o establish the geographical basis for the analysis of its local communities. Then, the background,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local families at the turn of the dynasties are examined. At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due to local turmoil, a number of local tyrants with their own military forces emerged in Pucheng. Some of these were aboriginals, and some were immigrants, who were not from northern China but from Zhejiang

and Jiangxi. Their base areas were outside the county, and their local despotic forces were based on farming. They were successively absorbed by the Fuzhou and Jinling regime during the Min and Southern Tang periods. Most were granted status as central or local military officers. But there were a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who abandoned their swords for the brush, the Yang family being an early case. There were also close marriag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familie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By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local tyrants of Pucheng had been transformed into scholarly families except for the Fan family.

Keywords: the turn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Pucheng, family transformation, local community